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13) 上



世界五千年

曹雪芹和《红楼梦》的问世

中国古典文学的形式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其中小说兴起得最晚，而影响也最大，在古代文学中有特殊地位。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的《红楼梦》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顶峰，是中国和世界文学宝库的一部巨著，是中国人民值得自豪的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它自问世以来，人们就争相阅读它、评论它。相信在将来也会有更多的人喜爱它。

要了解《红楼梦》，首先要了解它的作者曹雪芹。曹雪芹的祖先是汉人，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参加了满清政权，进入关内之后，隶籍于满州正白旗包衣佐领，是奴仆身份。曹家是皇室的家奴，所以又可以把曹家看作满人。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是曹家成为望族的创业人，他的妻子孙氏是康熙帝奶母，他就是奶公。康熙二年（1663）被派到江南，任江宁织造郎中，专为皇家办理织造用品和其他生活用品，官位不高，却是皇帝派出的亲信，地方官不得不另眼相看，实际地位较高。康熙帝赏赐曹玺正一品衔，这是非凡的殊荣，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病死于住所。其子曹寅，少年时代伴君读书，康熙三十一年（1692）被任命为江宁织造，继承父业，一直做到五十一年（1712）病故，这中间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他奉康熙之命，组织一帮文人，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他自身文才很高，善作诗词古文，喜作戏曲，他同江南的文士广交朋友，并为朱彝尊、施闰章等名家刊刻印刷文集。康熙帝六次南巡，曹寅赶上了四次接驾，把康熙供奉在他的织造署里。曹寅的女儿成为王妃。他的妻子李氏，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堂妹。曹寅时期是曹家的鼎盛阶段，但他开销大，家底子被花掉了许多，也是曹家衰落的开始。

曹寅死后，康熙帝命曹颀继承差使，对他颇为赏识，可惜他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夭亡了。康熙帝怜悯曹寅两世孤孀无人奉养，下令把曹宣的儿子曹寅过继曹寅为子，并担任他的职务。曹颀原受曹寅扶养和器重，他是忠厚老实的有点学问的人，但机变办事能力不足。自曹寅以来欠下的数额巨大的债，多年没有弥补，他在办理织造事务上又屡出差错，雍正帝清查钱粮，就以他“行为不端，贪污公款”为名。于雍正五年底下令抄他的家，罢他的官，曹家于是离开江宁，回到北京。曹玺祖孙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前后60余年，离开江南后家业凋零，一蹶不振。

曹雪芹的先世具有特殊的亲贵身份，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然而后来又逐渐破落；同时又具有高度文化素养。这些特性会给曹雪芹和他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由望族跌落低层，就使曹雪芹有可能体验到政治斗争的可怕和世态的炎凉，也可能帮助他形成揭露社会黑暗、寻求出路的创作主题思想。

曹家败落了，姻亲李煦遭到抄家充军的惩罚，姻亲平郡王纳尔苏被圈禁了，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家和亲戚的没落的事实，给曹雪芹提供了创作望族衰亡小说的既丰富又生动的素材。比如《红楼梦》第十六回写凤姐、赵嬷嬷议论元妃省亲的事，赵说皇帝南巡江南甄家四次接驾的盛况，把银子花得像流水一样，又说：“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曹雪芹写出这种情节就是因为他听说过，熟悉得很，因而能把它融注于文学作品中。并且有自己的观点。

曹雪芹生在书香门第，使曹雪芹有条件学习继承传统文化，从而学会动用各种文学体裁，书法、绘画、琴棋、戏剧等文人雅事，都可能有所师承，

这无异于给了他进行文学创造的才能技巧。

曹家隶属于旗人，又是满化的汉人。同时保留了汉人的文化和某些生活方式，是满汉文化融合的典型家庭，这就使曹雪芹能够在书中表现出以满族为主的满汉文化融合的历史。这样的家庭并没有常见的一些汉人的明朝的故国之思，也不会痛恨满人的统治。以上我们考察了曹雪芹的家族史。当然，要知道曹雪芹世界观、文艺观的形成，还要将他的家世和自身经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文献记载表明，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是曹颀之子，于康熙五十四年夏天出生在江宁织造署，乾隆二十七年除夕死于北京，按当时的计算年龄方法，享年48岁。

曹雪芹，名字叫霭，这个名字有感戴皇恩或天恩祖德的意思。字芹圃，表示将来学业有成，获得功名的愿望。取这个字和命名相联系，它们都反映了雪芹父辈对他的期望。曹雪芹还有个号叫梦阮，这阮指阮籍，阮籍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人，用梦阮为号，表示他们思想性格上有相通之处。雪芹是从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取来的，这个号是曹霭及其友人爱用的，显示了他的高洁的一面。雪芹又号芹溪居士，这同对佛教态度有一定关系。

曹雪芹的活动各种书籍上记载得都非常少，我们能够确实知道的，不过几件事。雪芹和敦诚、敦敏兄弟交谊笃厚，敦氏兄弟是清太祖的儿子英亲王阿济格的后裔，阿济格因罪被废，开除宗籍，敦诚这一支后来复归宗室。他们既是天潢贵胄，又是罪人后代，处境尴尬，很难做人。雪芹与他们的处境相似，经常与他们交游，互相唱和，雪芹英年早逝之后，他们屡以诗文悼念。雪芹另一友人张宜泉，也是旗人，孤苦贫寒，在北京西郊教村学。雪芹晚年与之过从甚密。与他交往最密切的多是不得意的人，这些人愤世不平，满腹牢骚，这是他们交游的思想基础。

曹雪芹的最后十年，在北京西郊的山村度过。张宜泉的诗中说到曹雪芹的住处有山有水，有花木，有飞禽，自然环境很好。但是这个地方偏僻，房舍简陋。雪芹的居处坐落在什么地方，有人说是今日香山南边正白旗村三十九号住宅，这个地方被辟为曹雪芹纪念馆，然而这地方缺乏足够的材料，很难被承认为雪芹故居。

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说曹雪芹“身胖头广面色黑”原来雪芹大头，体胖，黑皮肤，并不是某些小说传奇中所讲的那样，说曹雪芹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白面书生。

晚年，曹雪芹移居西山，生活穷苦，甚至到了吃不上饭，“举家食粥”的地步，常常要靠卖画来换酒喝。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红楼梦》的写作。乾隆二十七年（1762）幼子夭折，因为悲伤过度，曹雪芹一病不起，终于在这一年的除夕（1763年2月21日），在贫病无医中去世。

曹雪芹一生，历经荣华富贵，艰难困苦。这种有着重大转折的生活经历，给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提供了一定的生活素材和体验。

曹雪芹的诗意境高超，气势磅礴，韵律严整，他的好友敦诚在《佩刀质酒歌》里给了热情的称赞：“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影交寒光。”他还把雪芹与唐代大诗人李贺相提并论。雪芹善于作诗，但不轻易吟哦，今天留下来的，除《红楼梦》里的，就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具有卓越的绘画艺能，从《红楼梦》中薛宝钗论作画的有关叙述就可知了。他可能拿绘画来作过职业。通过一些材料推想，雪芹可能应召到

内廷画苑作过画工，因受侮辱而离去。

曹雪芹的才华是罕见的。他从小受到良好的系统教育，加上自身天资聪颖，悟性极高，这些都使得他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高妙境界。首先，曹雪芹是诗人，他的诗虽然仅存两句，但在《红楼梦》中数量众多的诗词曲赋，不仅能与小说的叙事融成一体，而且也能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做到了“诗如其人”。有些红学家指出，他的诗深受乃祖曹寅的影响。其次，曹雪芹还是一位画家，喜欢画突兀奇峭的石头，能寄胸中郁积之气于丹青之中，敦敏《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也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曹雪芹还懂岐黄医药、制作风筝等等。这些在《红楼梦》一书中也都有非常充分的表现。

曹雪芹缺乏经济来源，生活过得相当清苦，常常靠赊欠度日，为了生存，有时就得卖画了，敦敏的“卖画钱来付酒家”的诗句应是写实的。贫困不已，雪芹可能向阔亲戚请求过帮助，所以敦敏才对他讲：“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看来雪芹投亲遇辱，更加了解人世冷暖，《红楼梦》里写到刘姥姥到贾府借债的事，可能与曹雪芹自身的经历有关。

曹雪芹或许在右翼宗学当过差。敦诚赠他的诗有“当年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的句子，他们交往是在“虎门”。虎门，这里指学校，敦诚弟兄上过右翼宗学，因之推测雪芹到那里做过事。他的身份不可能当教官，雪芹即使在这里干过事，地位也很卑下。

曹雪芹的家庭人口很简单，有一个前妻；后来有一个续弦的，刚结婚不久，他就辞世了。雪芹晚年有一娇儿，不幸殇逝，使他身心遭到沉重打击，酿成疾病，又无力医治，就在儿子死后几个月离开了人间。雪芹弥留之际，痛独子夭折，怜爱妻之无依，柔肠寸断，一定是愤恨不平地、难以瞑目地离开人间。

除了上面一些有较确切记载的事迹之外，关于他的记载、传说还有一些。有的说雪芹是孝廉、贡生，当过侍卫，做过主事。这都是没有的事，功名、官职与雪芹无缘。有的研究者认为雪芹应聘到过江宁，在瓜洲作过画。有的说雪芹早年家中有个白氏仆妇，后来就依傍白氏居住。近若干年来，不断有所谓雪芹文物的出现，如笔山、印石、《自题画石》诗，还有什么遗稿，等等。这些传说、发现，有的已经被证实是假的，所以对有关雪芹的记载、传说、“文物”，必须慎重考核，决定取舍，万不可不加分析，信假为真，那就不利于认识曹雪芹和《红楼梦》了。

点点滴滴的资料表明，曹雪芹在雍正抄家前，居住在江宁织造署，度过童年、少年的富贵生活，抄家后回到北京，晚年流落西郊山村。他一生没有做过官，杂差可能当过，时间不会太长。他才华横溢，能文工诗善画，并以卖画来维持家庭生计。他清贫，一家三口往往靠赊欠度日。他善于交友，而择交甚严，为的是能志同道合，相知相识。

曹雪芹的思想、学识、性格如何呢？张宜泉说他的性格非常开朗，行动上放荡不羁，思想上也很少有什么顾忌，作风爽快，不讲城府。

作为一个对社会对人生都有深刻认识的人，曹雪芹傲视一切，具有可贵的“傲骨”人品，即对世情有看法，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出卖人格，不投靠统治势力，从而可以保持对世事的批评态度。雪芹嗜酒如命，赊帐也要喝两口。有一天同敦敏到朋友家去，主人还没有出来，雪芹却“酒渴如狂”，

敦诚也没有钱，当了佩刀买酒请他，这时雪芹高兴至极，作长诗以表示感谢。然而雪芹不是单纯地以酒为乐，他既不像《红楼梦》中邢大舅那样以酒装疯的无赖，也不像鲍二那样喝得烂醉什么也不管的废物，他清醒得很。雪芹憎恨作恶多端的统治者，蔑视饱食终日的富贵者，厌弃庸俗的人情世故，他喝酒，壮大自己的胆量，提起精神，去作画、吟诗、写书，用自己的笔去揭露恶势力、坏风俗。从雪芹的性格、行事，可知他同阮籍、刘伶不仅形似，更是神似。

曹雪芹和敦氏弟兄经常谈论江南家世的兴盛，探讨家业消亡的原因，并清醒地认识到盛世一去不复返的现状，感到追思无益，不如面对现实问题。但是多次的回忆，也表明雪芹对昔日兴旺的家世有所依恋。曹雪芹在思想上从亲贵世家走出来，更能够认识封建社会上层政治、经济、精神生活的状况，看到他们内部的争斗，道德的虚伪，生活的淫奢，政治的无能，从而不满现实，对往日家业的依稀怀念则成了次要的思想成分。

曹雪芹很会交流思想，裕瑞说他：“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雪芹讲话诙谐，雄辩，吸引听众，具有很高的说话艺术自不必说了，此外，一定内容生动，见解新颖，才能吸引非一般庸俗之人的敦敏辈；善于谈吐，还说明雪芹思想敏捷，条理清晰，是聪明才华的表现。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也有很生动的体现。《红楼梦》中每个人的言语都很符合其身份地位，曹雪芹一人而可以讲出这么多人的话，可见其谈话艺术的高超。

曹雪芹生前寂寞贫穷，死的时候只留下一部残缺的《红楼梦》。他的几位好友凑钱，才把他草草埋葬在通县某处，荒坟一丘，好不凄凉。可是在他死后不久，《红楼梦》残稿一经抄写问世，就受到欢迎，评、题、图、咏、汗牛充栋，轰动的程度，实为小说史上绝无仅有之例。曹雪芹是在贫病潦倒中死去的，但《红楼梦》在乾隆中叶以后，八十回抄本日益流行，到末叶已可公开在庙市中抄卖，并且每部能卖到数十金。

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情形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的是，曹雪芹仍然没能在生前亲自完成定稿，不能不说是千古遗恨！脂砚斋说曹雪芹是哭出一部《红楼梦》的。可见，《红楼梦》是一部多么感人至深的作品。

虽然《红楼梦》不是完成于一人之物，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作为一部小说，它的成就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从总体水平看，它也够得上世界文学之林中一流的伟大作品。

18世纪中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的时候，正是清朝的乾隆年间，封建社会制度业已进入它的晚期，它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了：佃农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国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重农抑末政策与工商业发展的矛盾，统治思想的僵化、残暴与反统治思想的斗争，腐朽的生产关系与要求日益发展的生产力的矛盾，都是相当严重的，尖锐的。作为社会主宰的地主阶级对于这些矛盾作较大变革则毫无可能。它的种种矛盾只能扩大、发展，而不会缩小、解决。这种封建社会所固有的矛盾的加深，是这个社会的不治之症。但是，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统治的王朝，这个民族统一全国的时候，才进入封建制不久，是属于上升的民族，它的统治，带来一些新因素，因而能稍许进行社会改革，出现康熙、雍正、乾隆连续三朝的数十年的较好局面，也即是人们所说的康乾盛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它要求发展，要求冲破封建主义的禁锢，尽管它很微弱，但作为新生事物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影响可以从人们的认识中间接反映出来。这是封建制度的又一种不可克服的危机。

康乾时期，就清朝讲还是兴盛年头，但却是封建社会的晚期，是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社会危机四伏，各种矛盾充分暴露，敏感的人已在探寻新的出路。但封建制还没有走到它的尽头，按其自身发展进程，也还有一段道路可走。同时还得看到封建制危机的严重性，看到封建制不景气给人们思想的冲击，应当紧紧把握晚期的时代特点。从社会发展阶段的宏观上看，这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代背景。

另外，康、雍、乾时期的政治斗争，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贫富之间的斗争，统治阶级倡导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也都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代背景的重要内容。

康熙晚年政治废弛，官吏贪脏枉法，民众暴动随之而生。雍正帝为扭转这种局面，剔除前朝弊政，清查钱粮，严惩贪官污吏，甚至频频采用抄家的办法，致使一些官僚倾家荡产和丧失生命。乾隆帝继位，恢复康熙帝的宽容方针，官吏贪污又盛行起来。

清朝政府的教育、科举制度异常腐败，八股文取士的办法尤其令人痛恨。到康熙中期，确定理学为统治思想，以朱注“四书”为教材和考试标准。雍正以后形成以四书文为正宗，其他学问为杂学的风尚，只许读书人埋首于理学与八股文，这样便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有统治思想，必然有反统治思想，明末清初就有许多人反对理学，雍正以后，形成反理学的潮流。

文字狱在康、乾时期之多、之残酷，在历史上是突出的。

地主阶级追逐生活上的享乐，到了封建制晚期的清代，来得更强烈，更肆无忌惮。达官贵人造花园，养戏子，尚异味，着华服，无所不用其极。

社会发展的状况与趋势、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斗争，现实的社会生活，不能不规定和影响曹雪芹的思想，决定他的愿望和要求，决定他的爱和憎；现实的社会生活，也必然启发曹雪芹，被他摄取去作艺术加工的原料，写出他的故事。

曹雪芹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写出《红楼梦》这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大百科全书，它反映出的艺术手腕和魄力，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红楼梦》的地位和影响来自它多方面的成就。《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的续书和改编情况、《红楼梦》批评史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目前，《红楼梦》在世界各国迄今已有16种文字30多种译本。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遍及全世界，“红学”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红楼梦》的不同版本也不断地有所发现。现知的抄本已有十多种，如：甲戌本

（1754），己卯本（1759），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南京图书馆藏戚蓼生序本，甲辰本（1784），舒元炜序本（1789），郑振铎藏本，《红楼梦稿》本，程甲本（1791），程乙本（1792）等。

阅读《红楼梦》的人会产生不少问题，评论家们更是众说不一，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开始是评点派；接着把《红楼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出现

了旧红学和新红学；近 30 年，红学更是勃兴，有一支不小的队伍，国内外都举行过讨论会，专门刊物不止一家。“红学”在《红楼梦》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未来的读者和评论家很可能也还会有争论。争论的问题很多：曹雪芹没有把书写完，在世时也没有定稿出版，只有抄本在少数人中流传，去世后抄本很多，并出了刻本，出现了续书，这就产生了版本问题，原作与续书的关系问题；作者及其历史的问题；著作者想在书中表达什么思想，要告诉读者什么，人们弄不清楚，封建时代的道学家说作者在宣传淫乱，而经学家又说是阐述儒家经典，民主革命家谓其立意在反清排满，资产阶级的另一派文人又认为它不过是作者的自叙传；与主题思想相联系的是《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问题，主题、背景搞不清，意义就失去了科学说明的前提，评论就很难说到点子上了；本书的创作手法，它的艺术性，人们赞不绝口，然而到底好在何处呢？这又形成了文学表现手法的问题，如此等等。

曹雪芹在开卷第一回说到他的创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担心人们不理解他的苦心孤诣，这就要求，读者在阅读他的书的时候，要认真思考，力求体会作品本身的涵意，以便读得好一些，收获多一些。评论者更要严肃认真，争取评述得准确一些，给读者多一点东西，也更忠实于原作。

抛开上述种种问题不提，先讲讲《红楼梦》最为突出的文学表现手法的问题。曹雪芹开卷就批评才子佳人小说的低劣的表现手法，他从才子佳人小说的失败上吸取了教训，深知人物形象简单、语言贫乏的弊病，来个“洗旧翻新”，不但在内容上打破传统的思想，在表现技巧上也作一番创造。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成就。

曹雪芹反对艺术上的公式化，要求别开生面，创造写作的新途径。他表示要按实际生活去写。社会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就写成什么样子，写出来就符合于生活本身。这是现实主义创作观点。运用它去创作，就会把变化无穷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表现出来，就会是新鲜的独特的情节，引人入胜的艺术，绝不会是千人一面的。曹雪芹按照他的原则，写出了与众不同的反映封建社会上层家庭衰落史的小说，写得符合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实际，宛如天然图画。所以他虽也写青年男女恋爱故事，却与才子佳人的小说迥然不同，不落旧套，新颖有趣。正因为艺术上别开生面，才有艺术长青的价值，为人诵读，这种艺术魅力的造就，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创新的文艺观。

在情节安排上，曹雪芹也是独具匠心。曹雪芹在开卷之初，以冷子兴“演说”交待贾府的源起及其发展趋势；叙述黛玉、宝钗进入荣国府，揭开故事的序幕；接着是凤姐协理宁国府和弄权铁槛寺，元妃归省，黛玉葬花，宝玉挨打，海棠社吟诗，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探春理家，二尤之死，抄检大观园等。故事一个接一个，衔接自然，线索清晰。故事有张有弛，起伏分明，如先写宝玉进大观园随意玩乐，袭人等劝谏不听，矛盾潜伏，接着就有贾政的痛打宝玉，矛盾激化，次后贾母干涉，宝玉任性发展下去，显出伏——起——伏的过程。故事之间互相联系，可以独立存在，又在总体中不可缺少。故事发展有伏线，有大情节的伏线，也有细情节的伏线；有的伏的远，也有的伏的近；有的埋伏给人悬念，提起读者注意；有的埋伏令人不知，而读到后来豁然贯通，恍然大悟。正是由于结构严谨，线索分明，就很好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塑造人物方面，曹雪芹堪称巨匠。在《红楼梦》出现的 500 多个有姓名的人物里，有几十个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例如贾政、王夫人等表现地主阶级中正统派的作风，他们追求名誉地位，讲究礼法，但虚伪，作恶多端而有所克制；贾雨村、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等，贪求权力、金钱，耍弄权术，无恶不作，其中凤姐、雨村是奸雄式的上层当权者的形象；薛宝钗，也是封建卫道者形象，但她与作恶者不同；探春，也是正统派，信守儒家教条，为人正派，不满现状，希望革新；贾母，是追逐并善于享受的统治者的形象；宝玉、黛玉反映的是地主阶级中开始分化的、不满封建制度、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因素的人物类型的代表；晴雯、鸳鸯是不满意自身奴隶地位并向主人作了一些斗争的奴隶的代表；袭人是对主人感激不尽，一心爬入主子集团的货真价实的奴才；紫鹃是受封建恶势力压迫又同主人共命运的义仆形象；来旺、王善保家是仗势欺人的奴才代表；刘姥姥是卑躬屈膝投亲靠友的平民代表；尤二姐是平民中逆来须受的人物代表；尤三姐，是平民中有某种理想并为之奋斗而不惜牺牲的形象。以上各类人物，就每一类看是反映社会上的某一种人，综合起来看，反映了社会上各种人。曹雪芹创造了各种角色，它们互相补充，几乎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各种社会人物的特征和精神面貌。

曹雪芹通过相貌、性格、语言、身份塑造人物，令他们神形兼备，栩栩如生。他写人物形状朴实自然，令人看到生活中的真实美，写出各人的体态特征及各自令人欣赏之处，绝不同于低能的作家用“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等令人生厌的滥语来形容他的主人翁。曹雪芹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活动刻画人物的艺术技巧是有口皆碑的，如写湘云心直口快，不防人忌恨，把黛玉比作戏子，睡觉也不文静，把手打在被外，喝多了酒，在花园石头上就睡着了。塑造出一个不拘小节的“名士”形象。

曹雪芹成功地刻画出每个人物的鲜明个性，所写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不是脸谱式的一看就知。如描写宝钗这个人，曹雪芹在贬她的同时，对她不乏褒扬，她是虚伪的，然而又是真诚的。曹雪芹对一些人物的贬是很含蓄的，如对袭人，不下贬词，但通过晴雯等开玩笑，揭露她的哈巴狗本质，又通过宝玉对她告密的怀疑，斥责她的走狗害人行为。曹雪芹摆脱了好人、坏人、小丑三个模子的束缚，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反映丰富而又复杂的社会生活。

曹雪芹反对之乎者也的八股文体，用新鲜活泼而又有韵律的语言，丰富的语汇，形象的比喻，写作他的小说，使它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他是运用语言艺术的巨匠。

曹雪芹采用民间的口语写作，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写人物的语言，符合人物的身份；写人物的形态，符合人物的性格。如奴仆兴儿品评他的主人，说凤姐“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用民间的生动口语刻画出凤姐阴险毒辣的程度。又讲探春，“浑名‘玫瑰花’”，“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刺戳手。”确是说明了三小姐有本事不好惹而又招人爱的特点。又说对黛玉、宝钗躲避远远的，不敢出气，“生怕这气儿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第 65 回）把一个弱不经风，一个冰清玉洁的状况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又如写刘姥姥在凤姐愚弄下吃饭的怪象，引起三次哄堂大笑，都在笑，但笑的形态不同。形形色色的笑，既令人眼花缭乱，又是纹丝不乱，即使在忘情地笑时，也要顾到人物的身份、性格。第一个笑的是湘云，

因她性情豪爽，早忍不住了。王夫人笑时，还要指着凤姐，似在责她太捉弄人，以显出自身宽厚的主妇身份，然而也趁机一乐。惜春找奶娘揉肚子，因她年龄尚小，地下伏侍的仆妇跑到外面笑，是不敢在主人面前放声痛哭。没有写宝钗的反映，她庄重，可能忍着不笑，也可能不屑凤姐所为。没有写迎春的动作，她可能麻木不仁，毫无反映。曹雪芹在写闹剧中，不忘表现人物性格，还给人留下回味的余地。

曹雪芹掌握丰富的辞汇，因而能运用自如而又完满地表述他的艺术形象。比如贾母的称谓，众人呼为“老太太”、凤姐管她叫“老祖宗”，僧尼则称之为“老菩萨”，刘姥姥又叫她“老寿星”，各人对同一对象称呼不一，是由自己的身份决定的，为的是讨贾母的欢心。贾母对这些符合自己心意的叫法，也很乐于接受。曹雪芹就有这么多的语词，描绘出贵族老夫人和巴结她的各种人的心理。

曹雪芹善于运用比喻说明事理。他的比喻贴切、生动，耐人寻味。如写潇湘馆的竹林环境，与黛玉的多愁善感相配合。再如柳湘莲说宁国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的，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第66回）这一对比，等于把贾珍等猪狗不如的肮脏灵魂和盘托了出来。

《红楼梦》的文字韵味很浓，读来令人受益无穷。曹雪芹爱用韵文，前八十回中，诗、曲、词、赋、酒令、谜语、对句、书启，有190余条。这些韵文，有的写的有哲理，耐人深思。有的个性化了，符合书中人物身份。如第三十七回，写探春、贾芸分别给宝玉写信，一个书写典雅，是很有才气的探春的手笔，另一个写得平庸，文白相间，是学问有限的贾芸的文字了。

在思想性方面，《红楼梦》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复杂性，一是进步性。《红楼梦》描写的社会生活是广阔而深刻的，它对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等社会现实，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等，都进行了描述和反映。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作者具有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作者的理想和主张曲折地反映了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他在《红楼梦》中对真、善、美作了热情的讴歌，对假、恶、丑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红楼梦》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红楼梦》艺术规模的博大精深，即使在整个人类文学史中也是罕见的。首先，《红楼梦》在艺术上最重要的特点是其叙述和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深厚、逼真、自然。这跟《红楼梦》的结构安排有关，它不像通常那样用单线结构的叙述方式主要描述中心人物的活动，将其他与中心人物可能发生联系的社会关系弃置不顾，而是以贾宝玉为中心人物，以贾、林、薛爱情婚姻纠葛为贯穿线索，并把它们放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围绕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全面展开对各种次要人物和次要情节的描叙。这种多线索、多层次、多角度而又呈一种网状加辐射式的艺术结构，完全可以反映生活的全景、揭示多层面的社会矛盾。这种艺术结构，是曹雪芹的一个伟大创举，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红楼梦》在艺术表现上普遍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其中以男人与女人的对比尤为重要，贾宝玉七八岁时就道出了这一天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当然，《红楼梦》里的“女子”主要指年轻女子。曹雪芹又为女性世界设了个活动场所：大观园。于是，大观园内外绝然成两个世界。大观园内以女性

为中心，大观园外以男性为中心；大观园内是被统治者的世界，大观园外是统治者的世界；大观园内是一个自由天真、充满青春的欢声笑语的女儿国，大观园外在权威和礼教的外衣下处处是贪婪、腐败和丑恶；大观园内贾宝玉和少女们之间是天真无邪的情谊，大观园外的男子贾珍、贾蓉、贾琏之流有的只是无耻下流的勾当；等等。当然，大观园里也是花开两朵各在一枝的，例如贾宝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追求个性自由，背离封建礼教，而薛宝钗、袭人自觉地维护封建礼教。

《红楼梦》文字生动，情节动人，我们读的时候，常常会心地笑了，或忍俊不住，大笑起来，或蹙眉悲伤，叹息不止。没有完美的艺术性，那能引起读者的如此强烈的共鸣。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成就，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最高峰。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能准确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推动情节的向前发展。《红楼梦》作者往往只用三言两语，便可以勾画一个活生生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形象；由于《红楼梦》人物众多，而且处于不同的社会层次，因此要做到各个人物的语言不雷同、不生硬，已经不是容易的事。而作者却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可见是匠心独到了。又由于《红楼梦》里颇有些文思敏捷、悟性极高的女子（如林黛玉、薛宝钗），因而她们的个性化语言同时又洋溢着智慧美。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作者的艺术才思。

作为我国古典文学巨著的《红楼梦》问世已经近300年了。300年来《红楼梦》的艺术感染力一直没有减退，一代又一代人从《红楼梦》里获得丰富的精神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的确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太平天国和金田起义

广西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是个多民族地区，广西的西北部，社会经济的发展较缓慢，尚保存土司制度的残余。历来被称为地瘠民贫的广西，自然灾害严重。但是，就是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封建剥削十分苛重：田赋，最低课银为广东二倍半，最低课米为广东五倍半强；地租也在百种千租至百种二千租之间，或收成的六成至七成。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严重的封建剥削，广西西部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在天地会组织领导下，广西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有名号的起义队伍达 100 多支，每支从数十人至万人不等，他们攻城略地，劫富济贫，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鸦片战争后，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大批失业游民，纷纷沿着西江、湘桂走廊进入广西，其中有湖南李沅发、雷再浩，广东李泳酬，他们都相继转移到这“天高皇帝远”的地区继续斗争，使广西原有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这些都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有利因素。

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首先发动的原因，还在于清政府在这个地区的统治比较薄弱，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便于起义军组织队伍，积蓄力量，长期坚持斗争。

便于起义军存在发展的又一因素是优越的地理环境。金田村位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南麓，山区幅员 270 多平方公里，四周环抱着高山深谷。东有大帽山，西有双髻山、白马山，南有鹏隘山，北有洪水界和五指山，山中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地势十分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有“一夫当关，万众莫敌”之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洪秀全，1814 年 1 月 1 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一个务农之家。父亲洪镜扬生三子，长子洪仁发，次子洪仁达，三子洪仁坤即洪秀全。洪秀全幼年时代在家乡私塾读《四书》、《五经》，青年时代曾热衷于谋取功名，1837、1838、1843 年共三次赴广州应试，但屡试不第，从而萌发了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1836 年他在广州偶然得到《劝世良言》一书，后经细心阅读，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产生了拜上帝、敬耶稣、不拜偶像的思想。1837 年，洪秀全从广州科场失败归来，精神恍惚，害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 40 余天。病好了之后，洪秀全便向父母亲友宣传拜偶像之罪恶及信奉上帝之必要。冯云山、洪仁玕就是接受了他的宣传后，走上反清起义道路的。

冯云山，广东花县禾落地人，1821 年生于一个小康之家，自幼熟读经史、天文、历算、地理、兵法等书，与洪秀全是同乡又是同学。成年以后，家道中落，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也都没考中，后便在农村私塾教书为生。1844 年 4 月，洪秀全带冯云山离开花县，出游天下，一起传道，结交天下英豪。5 月，洪秀全、冯云山抵广西贵县赐谷村，劝人拜上帝，捣毁六乌庙偶像。在赐谷村逗留四五个月中，因洪、冯之间发生小小的矛盾，暂时分手，各奔东西。冯云山于 9 月 5 日离赐谷去广西桂平县，做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洪秀全则于 11 月返回家乡潜心钻研教义。冯云山从象州、浔州、郁州到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县，深入山村矿区，宣传拜上帝教义。到 1847 年 8 月，拜上帝会的会众发展到 2000 多人。其中有石达开、杨秀清、肖朝贵等骨干分子。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1822 年生于广东花县官禄布的务农之家。自幼

读书，成年后科举考试不中，回乡当塾师，接受族兄宣传，学拜上帝道。

1847年3月，洪仁玕随族兄洪秀全，从花县到广州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教堂研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达三个月之久。新旧遗诏书即现在的新旧约书。

杨秀清，出身于广西桂平一个世代耕山烧炭的家庭，自幼生长深山之中，很小就成了孤儿，其人足智多谋。

石达开，1831年生于广西贵县北山里奇石墟那邦村的一个小康之家。

肖朝贵，出身于广西武宣贫苦农民之家，他是个大力士，是经冯云山宣传参加拜上帝会的。冯云山被捕入狱后，他与杨秀清一起，假托天父附体，领导拜上帝会众继续坚持斗争。

韦昌辉，初名正，桂平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

从以上六位首义核心人物看，大都出身寒微，不同程度上遭受清政权统治的压榨欺凌，所以，当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宣传拜上帝教义时，得到群众的热烈响应，这些骨干分子也全力以赴支持洪秀全。

洪秀全在获得《劝世良言》之后，逐步形成了宗教世界观，开始了教书与传道相结合的生涯。这期间，他撰写了大量作品，据说多达50余种，其中留传下来的有《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这些作品，透过宗教教义，可以窥见其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内核，而且一篇比一篇明朗、深刻。

《原道救世歌》把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义揉合在一起，劝人敬拜上帝，勿拜邪神。把人们历来供奉的如来佛、观世音、张天师等各种偶像、佛像，统统宣布为邪神妖魔，把历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皇帝、贵族、官僚也作了抨击和否定，认为他们也是与自己平等的人。《原道救世歌》有两点极为精彩的内容，一是主张禁止鸦片，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宣扬无分贵贱，君民一体敬上帝的思想，把君王与民众平列，在上帝面前无特殊可言，实际上具有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而且还带有一些民主主义的色彩。

每当洪秀全主持讲道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他们男女分座，先唱一首赞美上帝的诗，然后宣讲上帝的仁慈，劝大家改恶从善，真心崇拜上帝。有时候，他们还举行入教仪式：神台上放着两盏明灯，三杯清茶，新入教的人大声念着自己的名字，再把一张写着自己名字的“忏悔状”烧掉。在跪下回答主持人的问话以后，主持人把一杯清水浇在他的头上，口里还念念有词：“要洗净从前罪恶，要除旧生新……”入教的人站起来把清茶喝了，并用清水擦洗胸口，表示洗净了内心。

洪秀全对听他传道的人反复地这样说：“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应该平等相爱。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解救苦难。我是耶稣的弟弟，也受命下凡救世。现在大大小小的妖怪践踏了上帝的真道。崇信上帝的人就要起来赶走他们，夺回自己的权力！”

拜上帝会是冯云山约于1846年在广西紫荆山区亲创，是在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基础上的进一步组织化。初为宗教团体，进而演变为政治团体。

洪秀全传教初期，信奉真道者不过十多人，不久一些农家富户也纷纷入会，皈依上帝，拜上帝会成为紫荆山区的一个新团体。

入会的首要条件是拜上帝——信奉上帝。拜上帝教教义现定：上帝是独一无二真神，其他诸神，均为邪神，只拜上帝，不拜邪神。

经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深入宣传，众弟兄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

鬼。1847年，洪秀全、冯云山带领会众在象州古车村捣毁甘王庙，在蒙冲捣毁三圣宫，在田心水、花雷水一带捣毁社坛（土地庙），这是贯彻拜上帝教义——只敬上帝，不拜邪神的具体行动。

捣毁木石泥团偶像的斗争，实际上是捣毁人间妖魔斗争的预演，对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促进群众觉醒，起了积极作用，使广大会众“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由此，当地的地主土豪大为惊恐，他们秘密绑架冯云山，准备把他投进桂平监狱。拜上帝会众闻讯后，立即组织起来，抢回冯云山，从而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紫荆山的拜上帝会友，为了庆贺冯云山归来，杀牛宰马，献祭上帝。拜上帝会成员在内部以兄弟姊妹相称，成员们相互团结，这对发动有组织的大起义非常有利。

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创立的拜上帝教及其组织，已经把西方的上帝与中国的劳苦大众要求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实现有衣有食，无寒无灾，趋吉避凶的善良意愿结合起来。正因为如此，它一产生就取得广泛支持，迅猛发展。

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号召各地会员到金田村“团营”。会员们听到团营的消息，知道起义反清的日子快到了，个个心情振奋。扔下活计，变卖了家产，扶老携幼地奔向金田村。会员们到金田村团营后，把变卖田产家业所得的现金和其他财物全部交入“圣库”，吃饭穿衣和杂用都由“圣库”按规定发给。当官的也和普通会员同甘共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大家都非常高兴。同时，他们也加紧整编队伍，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赶造武器，准备正式宣布起义。

这年12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37岁生日。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率领着全体将士来给洪秀全祝寿。洪秀全接受祝贺后，就按预定的计划，让全体将领和战士到金田村前韦氏宗祠门前的广场集合。

一队队汉族、壮族、瑶族战士们手执大刀长矛，男女分营排列，在欢呼声中，洪秀全登上韦氏宗祠门前的高台，昂然站立，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站在他的两边。洪秀全庄严地宣布说：“今天‘拜上帝会’正式起义了！我们要推翻腐败的朝廷，让天下太平。我们的国号就叫太平天国，为的是让穷人过上太平的日子。”在一片“杀妖”的喊声中，洪秀全接着说：“太平天国现在已经有200多个能安邦定国的人才，可以作文官；还有一千多有勇有谋的武将，有3万威如猛虎的雄兵，何愁不能杀‘妖’！”

在团营的过程中，起义军累累遭到清军阻拦堵截，发生一些大小不等的战斗。其中较大的一次战斗是：清军围困隐藏在胡以晃家中指挥起义队伍的洪秀全、冯云山。胡以晃所住平南县花洲山人村，四周皆山，仅有一条山路通出外方，清军侦知洪、冯行踪后，即派兵扼守于山路小道，并在路上遍插短尖木桩。在这危难关头，杨秀清调集拜上帝会友前往营救，在路口双方发生激烈战斗，起义军以强大攻势战胜了清军。次日，当清方增援部队至山路口，起义军已救出洪、冯，安全撤离。

金田团营后，拜上帝会众在紫荆山中的金田村韦昌辉家、白沙圩及平南鹏化山区的花洲山人村等几个地方打造武器。在韦昌辉家的横屋摆开了12座打铁炉，日夜开工。为了掩护铸造兵器，在他家后院池塘边特意饲养了30

多只大白鹅，用大鹅的嘎嘎鸣叫声冲淡打铁声。

拜上帝会在金田村边的犀牛岭利用方圆2里、高约数十米的土岗构筑营盘。营盘长35米、宽22米，四周加高3米、底宽2米的土墙。

起义力量的集结，引起了清朝地方当局的注意。清军紧急赶到思旺墟，以堵截起义军的退路，又驻兵五峒山区，切断金田与鹏化洲之间的联系，形成合围之势。起义部队在杨秀清指挥下，先发制人，在思旺墟对尚未站稳脚跟的清军侧翼发动奇袭，获得全胜。战后，清兵指挥官在奏折中承认失败。

思旺墟战后，拜上帝会众即撤回金田，11月29日，双方又在蔡村江一带进行决战。这一仗由洪秀全、冯云山指挥。杨秀清、肖朝贵分别担任左、右路军统帅。起义军阵斩敌副将伊克坦布，把总潘继邦、刘洪海、保定清、何其庄、杨万福，外委王兴、黄建勋、彭昌镛，千总田事寿等，取得蔡村江大捷。

拜上帝会乘胜举行起义。洪秀全率领大家三拜之后，发表誓词：

大旗弯弯，跳过火山，
忠心之人，富贵荣华；
奸心之人，丧在其间。

接着，宣布《五大纪律诏》：

- 一、遵条命（遵守天条和命令）；
- 二、别男行女行（男女分行）；
- 三、秋毫莫犯；
- 四、公心和傺（即和睦），各遵头目约束；
- 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这五大纪律是维护起义队伍团结、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接着正式建国号为太平天国，并封立洪秀全的继承人。这标志着拜上帝会团营的胜利，以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为宗旨的太平天国起义揭开了序幕。

金田起义时，组织系统极为简单，在天王直接统率下，设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其下为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

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太平军即挥戈东进，攻占大湟江口。大湟江口在桂平县城东36公里，是大湟江与浔江的汇合处。上通桂平、贵县，下达平南、苍梧，交通方便，商业繁盛。当时，在附近活动的天地会组织，在罗大纲、苏三娘、邱二嫂、大头羊（张钊）等人率领下，共约7000—8000人，纷纷投入太平军，壮大了队伍。攻占大湟江口以后，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钱财，补充了太平军的军需物资。原本计划水陆兼程进军桂林，但江口船只已被清军掳掠一空，不得不改从陆路行进。

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被拥为天王，天王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以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以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以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以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永安是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占领的第一个城市。永安州位于广西东北部，东连昭平，西接金秀（大瑶山）、平南，南毗藤县，北靠荔浦、平乐，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由罗大纲率领的先锋队，一跨入永安州境，就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响应，东平里夏朝等农民，闻太平军到来，成群结队去迎接太平军。在驻留半年多时间里，永安的广大贫苦农民与太平军一起设防，打

击地主，没收他们的浮财，共同收割地主田禾，收获所得，各取其半。当时留传下来的一首民歌：“霜降田禾熟，天军、百姓同割谷，耕田大伯有饭剩，天朝圣库米粮足，田主偷偷哭。”

太平军在永安停留约半年之久，由于这儿粮食充足，为太平军久留永安提供了物质条件。

经反复酝酿讨论之后，1851年12月17日，举行封王大典。洪秀全以天王名义发布诏书，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在永安，明确了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领导核心，规定了各王职责及其统属关系，这是农民起义的发展和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

整肃军纪是太平军在永安的另一大任务：凡是战斗中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建立记录功罪制度，作为晋升依据。另外，还规定了官职和朝服制度，凡阵亡将士，都妥善安排后事。这些奖惩、抚恤规定，有助于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尽忠报效。

1852年2月3日，颁行了由冯云山亲创的天历。天历以366日为一年。单月31日，双月30日。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俱16日，余俱15日。太平天国使用自己创制的历法，对清王朝通行的历法进行否定，具有鼓舞群众，解放思想，为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而斗争的作用。

正当太平军的首领们计划着如何从永安突围出去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得到报告说，前几个月返回家乡的周锡能带着两个人回来了。周锡能本来是“拜上帝会”的老会员，金田起义以后作了军帅。太平军转战象州的时候，他求见杨秀清，对他说：“我的老家博白有很多参加了‘拜上帝会’的兄弟姐妹。因为团营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跟上大队，没能参加起义。请您允许我回去招集他们，一同来参加太平军。”杨秀清答应了。周锡能离开了太平军，一去就好几个月，现在听说他回来了，杨秀清很高兴，马上让周锡能进来，问起他走后的情况。

周锡能说：“我回到家乡后，把兄弟姐妹们带了出来，可是清兵把守关口十分严密，结果大部分人过不来。只有几十个弟兄和我一起假装当了妖兵壮丁，先投到了妖营。现在他们都急着要投奔天朝呢！”杨秀清问他怎样把其他弟兄带出来，他又说：“我打算过一两天，再回到妖营，领他们过来。”杨秀清问：“妖营既然把守甚严，你怎么能随便出入哇？”周锡能愣了一下，说：“因为妖官命我把守关卡，所以我才能趁机逃了回来。”

杨秀清听完，面带笑容地说：“你为天朝召来兵将，立了大功，等我报告天王，重重赏你。”说完他让周锡能出去了。其实，杨秀清见周锡能回来得这么突然，说话又支支吾吾的，便产生了怀疑。他是个细心人，连忙派人严密监视周锡能的行动。果然，杨秀清接连得到报告：周锡能和带来的朱八、陈五两个人找到两名太平军的军官密谈了很久；周锡能到处观察打听太平军防守情况……杨秀清再进一步调查，终于掌握了真实情况。

这一天，他把周锡能叫来，让他把这次进永安城的来意说出来。周锡能却连声狡辩。杨秀清大怒，当场一条一条地揭发出了他的罪行，还把那两个要叛变的军官叫来作证。周锡能见事情败露，立刻瘫软在地。

原来周锡能当时就是因为怕苦怕死才离开太平军的。他没有回家乡，而是投降了清军，出卖了太平军的内部情况。清军统帅赛尚阿喜出望外，立刻答应给周锡能官做，又让他混进永安城，等清军进攻永安时作内应。周锡能

回到永安后，就拉拢将士叛变，又侦察太平军的设施，还策划杀害洪秀全和杨秀清等首领。

杨秀清果断机智地审出了叛徒的活动，下令把周锡能等人斩首，清除了内患。这件事教育了太平军官兵。他们对敌斗争的勇气大大增强了。

当时，清军继续加紧对永安的军事包围，乌兰泰在独松岭至栾岭间分扎四个营盘；赛尚阿从荔浦窜至永安；向荣统北路清军南犯；使屯驻永安的太平军陷于粮草殆尽、清兵数十万四面重围、无路可出的困境。1852年4月4日，天王洪秀全向全军发布撤离永安的总动员令。5日，太平军以罗大纲部为先锋，秦日纲为殿后，冒雨从永安突围。6日，在古苏冲、龙寮岭，与乌兰泰所率清军接仗。8日，太平军在平冲、旱冲、崩冲发起反击，歼灭清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及兵勇5000余人，乘胜北上，向荔浦、阳朔、桂林方向进军。

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后，杨秀清指派先遣队乔装清军，水陆兼程，准备智取桂林。不料，向荣已率清军提前到达桂林。太平军智取计划不能实现，只得扎营于城西南漓江边的象鼻山下，拟作强攻。4月19日，与清军交战，毙伤乌兰泰，由于桂林城坚兵众，太平军攻打一月余不下，5月19日便弃桂林，下全州。在攻打全州的战役中，南王冯云山炮，牺牲于蓑衣渡，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最大之损失。冯云山是拜上帝会创始人，他和太平天国各位首领的关系都好，威望很高，他的不幸牺牲，给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罩上了阴影。但是整个队伍正在一天天壮大起来。

在道州，太平军内部进行了思想整顿，针对广西籍将士意欲由灌阳返回家乡的狭隘观念，东王杨秀清提出了“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鼓励战士们继续北上。

太平军在道州休整两个月后，于8月中旬移师郴州。郴州为湘南重镇，盛产硝磺，太平军在郴州吸收一批挖煤开矿人入伍，由此正式建立土营，专门从事挖地攻城任务，为胜利进军增添了战斗力量。

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开始了进军长沙的战斗。太平天国军事指挥部探得长沙空虚，即以主力部队留郴州，派西王肖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统领2000余人，准备奇袭长沙。自8月17日出发，未遇清朝兵勇，连克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9月10日到达长沙南门外沿冈岭，次日即趁敌不备，发起猛攻，首战告捷。太平军又乘胜攻打长沙南门，双方发生激战，在9月12日的战斗中，肖朝贵中炮负伤，不久殉国。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继冯云山牺牲之后，又一重大损失。

不久，太平军攻占岳州，形势很快发生了有利于起义军的变化：首先是地理位置重要，岳州为北省咽喉，易守难攻。其二是，大批船户投奔太平军，使太平军得以利用民船建立水营。有了水营，可以在江河湖面上发挥战斗力，为入武汉三镇、东下金陵，提供了重要条件。其三，在岳州意外地缴获了吴三桂遗留军械，改善了起义军的武器装备，为胜利进军增添了物质基础。

太平军在岳州逗留三天后，即于12月16日以15万大军水陆兼程，出洞庭，入湖北。当时，清廷采纳“三面会剿”的策略，急派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调黑龙江马队和直隶、甘肃、陕西等省标兵万名入防河南；又令江西巡抚张芾、安徽巡抚蒋文庆，沿长江下游各地设防；还令向荣自长沙尾随太平军以救武昌。

太平军冲破“三面会剿”，于1852年12月22日克汉阳，29日占汉口，

洪秀全、杨秀清胜利入城。可巧当年冬天干旱少雨，江水极浅，江面露出一块块巨洲，太平军以舟木相连，架为跨江浮桥，使汉阳直通武昌。一支在陆路行进的太平军，直插武昌东门外的洪山、小龟山，进而包抄文昌、望山、保安、中和、宾阳、中寿、武胜等门。1853年1月12日黎明，太平军轰崩武昌文昌门，城墙炸塌27丈。石达开部入城，围城太平军纷纷架云梯从四周入城。太平军在武昌，重申军纪，明确打击对象为清朝政府的官员和军队，而百姓，包括官兵的家属皆被列为保护对象。根据这一政策，没收清政府及其官员的库藏钱物。为了扩大队伍，对广大群众，在政治上予以保护的同时，动员参军并进贡钱物，多处设馆，动员青壮年登记。有的编入太平军，有技艺的匠人则参加各类土木机构。对妇女，实行集中居住，称姊妹馆；对年老或有残疾者，亦以25人为一馆集中居住，称老人馆。各馆的油、盐、米等生活必需品，由太平天国政府集中分发。太平天国攻占武昌后，还把交易市场设于城外，称为买卖街，准许城市居民出汉阳门，买鸡、猪、鱼、虾、饼饵等农副产品。

太平天国在占领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所采取的措施，尽管由于时间短促，还不是很完备，但基本轮廓已很清楚。

太平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声威大振，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起义军的急剧变化。摆在太平天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迅速结束流动作战的格局，建都立国，夺取全国胜利。

在当时，就太平军的去向，有数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直捣北京；建都于中州之地；顺江东下，建天京于金陵；立足武汉；入川。这几种方案的利弊及可行性，经过争论与比较，才确定顺江东下，建都南京的方案。

有人认为，太平军攻取武汉三镇后，如果一鼓作气向北挺进，便可夺取全国胜利。就当时军事形势来看，太平军直捣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时太平军号称50万，其中包括大批随员家属，实际能打仗的不过10多万；北京是清政府所在地，兵力集中，常备旗兵14.9万人，绿营兵60余万人，太平军自金田起义直到武汉，一直未与清军主力部队交锋，未歼敌之生力军，冒险北上，也很难“直捣”。况且，主要来自两广的战士，陡然进入天寒地冻之区，必然水土不服，宗教信仰上，也与北方群众格格不入，势必影响动员群众、壮大队伍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太平军北上取胜把握极小，败亡的可能性则很大。太平军在进入武汉三镇前，未提出北上直捣清王朝心脏的行动计划，这无疑明智的。

咸丰三年正月（公元1853年2月），太平天国大军分水陆两路沿长江两岸东下。陆路由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指挥，水路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率领。洪秀全乘坐的龙船，行驶在水军中央。水军船只一万多艘，风帆旌旗，遮蔽了大江，从头到尾有几十里长。陆路大军遍布大江南北两岸，浩浩荡荡，急速前进。这排山倒海的气势把节节败退的清军官兵吓破了胆。清朝钦差大臣向荣不敢和太平军正面接触，完全躲开又怕向咸丰皇帝交不了帐，就不远不近地跟在太平军后面。太平军挺进他就率军紧跟，太平军停下来他也不敢前进。他根本不敢追赶，总是和太平军保持一定距离。

太平军进军到湖北东部广济县老鼠峡的时候，两江总督陆建瀛率领3000多清兵进行堵截。刚一交战，清军就败退，陆建瀛率领残兵败将，逃到南京去了。太平军势如摧枯拉朽，很快就占领了九江、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

南京有外城和内城两道关口。陆建瀛逃回南京以后，想凭借坚固高厚的城墙固守，和太平军顽抗。太平军水军停泊在南京城北面的长江上。从上游新洲戴胜关到下游七里洲，布满了船只，一眼看不到边际。陆军则在长江岸边建立了24座军营，威武严整。为了减少攻城的阻力，洪秀全叫太平军战士在南京城外空旷处搭了许多高台，让口齿流利的人到高台上向城外的群众宣讲反清的道理和太平军的纪律。他们说：“天王领导的太平军决不伤害老百姓，乡亲们不要害怕。你们回去转告街坊邻里和亲戚朋友，就说太平军是专门打妖官妖兵，让大家过上太平日子的。”太平军还发布安民告示，安抚老百姓，老百姓听了，都争着把自己家里的大米、蔬菜和猪、鸡、鸭送来慰劳太平军。有的人还把身边的钱掏出来，交给太平军战士。

守在南京城头的清军官兵抬眼望去，见从南京城外到江东门，纵横十几里，遍地都是头戴红巾，身穿短衣，手拿刀矛的太平军，不觉心惊胆战。陆建瀛急得没办法，哄骗士兵说：“不要害怕，有观音大士帮助咱们守城。只要大家都磕头烧香，就保证没事儿。”又叫士兵把丧门神的凶像抬上城头，吓唬太平军。

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太平军决定攻城了。从广西来的挖煤工人悄悄地爬到南京城边，在北门凤仪门的城墙埋了火药、地雷。只听“轰隆隆”一声巨响，在迷漫的硝烟中，城墙倒塌了。太平军战士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一场短兵相接，清兵纷纷倒地。守在这里的陆建瀛也被砍死。清兵纷纷丢下刀矛，慌忙向四处逃散，太平军占领了外城。接着，太平军又冒着内城守军的炮火，攻开南城聚宝门和水西门、旱西门，像潮水似地涌进内城，杀死清朝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攻占了南京城。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首领在十多万太平军将士的簇拥下，进入南京。他们决定改南京为天京，把它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

此后，太平军又相继占领了天京周围的镇江、扬州等地，在江南广大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片太平天国占领区。

太平天国把天京城内的群众分成男行女行，设立了男馆女馆。男的除参军外，有手艺的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从事集体的手工业生产。女的编入女营和绣锦营。

太平天国贴出“招贤榜”，欢迎知识分子为天国办事，又通过科举考试，招揽文武人才。凡有一技之长的，不论门第出身，都量才录用，还特别开设了女科。他们坚决反对孔孟之道，不许读他们的书。

太平天国发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不论男女，不分老少。他们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还提出要建立基层政权组织——乡官制度的方案。方案拟定每五家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组成一个“两”，由“两司马”负责管理。农民收获的粮食，留够吃用外，一律上缴国库。遇有结婚、办丧事、生育小孩等事，由国库按统一规定的标准发给银钱和粮食。鳏寡孤独和残废、有病的人，也由国库出钱出粮养活。这些美好的理想虽然由于战争等原因没有实行，但是表达了穷困农民的愿望。

洋务运动

曾国藩、左宗棠及他们统率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和权力。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曾、左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权力日益增大。他们都是清廷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刽子手，但他们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面对外国的侵略，他们也在寻找救国的方案。他们基本上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便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1861年1月13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钦差大臣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向咸丰皇帝上疏。这些满族权贵是当时的略识时务者，鉴于英法侵略军猖狂的侵略，不禁产生忧国忧民的思想。他们的对外策略暂时以和好为权宜，等条件成熟再与外国相对抗。因此，他们悉心筹划，统计全局，拟订六条章程，建议咸丰帝实行。首先一条是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奕訢等上疏的第二天，咸丰帝下谕，命筹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和办理三口通商事务机构，并对负责经办的官员作出具体决定。

1月21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奕訢向咸丰帝提出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并雇法国人传授制造技术的建议。三天之后，咸丰帝就发布了清代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第一个“上谕”，这样，洋务运动的序幕就拉开了。

3月11日（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正式成立。从批准到成立，不到两个月时间，其办事速度之快，十分异常。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它下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处理原由理藩院和礼部掌管的某些事务。此外，它还包揽了与外国有关的一切财政、军事、教育、矿务、工业、邮政、交通等大权。它不专为办洋务而设，但实际上是办洋务的中央领导机构。最初由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3人管理，从内阁、部院、军机处司员中挑选满汉各8人为章京，处理日常事务。为了具体管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各通商口岸，清政府同时又设置南北洋两个通商大臣。

奕訢（1832~1898）是道光帝第六子，当朝咸丰帝的弟弟。他在主持总理衙门23年（1861—1884）的时间内，一直贯彻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积极支持某些地方官员开展洋务运动。他是清朝发动和坚持开展洋务运动的首领，是洋务运动的中央决策者和洋务派的代表。

洋务运动的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1811~1872）。曾国藩凭借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勋”，作了两江总督。他对鸦片战争的态度与他的老师穆彰阿的主降路线有所不同，他主战。他赞扬广东人民反击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认为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打出了中国人的气概。他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使外国侵略者不再有武器上的优势。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从他将领和幕僚中，涌现出一大批兴办洋务的积极活动者。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刘铭传、丁汝昌、薛福成、冯桂芬等，都是推行洋务运动的中坚。其中，李鸿章（1823~1901）经办的洋务事业和企业最多、最大，涉及面最广，办洋务的时间最长，加以他身居要位，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职，影响甚大，成为继曾国藩之后的洋务派的首领。

中华民族的各阶层、各方面的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起点，以不同的方式，投入洋务运动之中。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成了洋务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一些爱国的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成了洋务运动的智囊和活动家。

一些出身于买办阶级的人成了推行洋务运动的骨干和企业家。一批最早了解西方科技的学者，成了筹办洋务企业和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的专家和工程师。积极参加洋务运动的还有原来的巨商大贾及子弟，还有一批去海外经商致富归国的华侨。洋务运动后期，办洋务著名的人物，有张之洞、盛宣怀和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女婿聂缉槩。

这些人就是历史上的洋务派。与洋务派对立，阻难洋务运动进行的就是顽固派。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有倭仁、宋晋、刘锡鸿等人。他们竭力反对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主张严格遵守祖宗成法，注重礼义道德，维护纲常名教。他们攻击洋务运动是“不顾礼义廉耻”、“祸国殃民”。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在洋务运动开始产生的时候，洋务派就明确地表示了这一点。

1861年7月7日，奕訢等再次奏请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懂先进技术的官员训练京兵。

1861年8月23日（七月十八日），曾国藩也奏请购买外洋船炮，演习试造。农民军“实鲜船炮，不能与我水师争衡。”据此，应该指出的是，洋务派购买船炮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是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者。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初期的骨干分子，中后期的领袖。他最初要办洋务的动机和目的是有代表性的。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办洋务是把对付外国自强御侮放在第一位的。

左宗棠在他的书信里，也表明了和曾国藩、李鸿章相同的意图。

清朝政府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还买了大批洋枪洋炮来对付起义军。外国的新式武器确实比中国的土炮和长矛大刀厉害得多。

洋务运动是从造枪炮等军事武器开始的。要自强，不受制于人，就必须有军事实力作保证，争取一个能够自强的和平环境，如果没有和平环境，天天以落后的刀枪去应付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哪有时间来自强？又怎能从外国人那里去获取近代科学技术？

洋务运动之所以从军事开始，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压迫的结果，是外国的洋船洋炮确实利害的启发。因为中国是被强迫开放与外国通商的，所以它最初表示愿意采用的西方科技很自然是在武器方面。中国认为它的战败是由于外国武器的优越性，因为中国对西洋的武器的价值作出了很高的估价，所以中国建设造船厂和兵工厂的动力很大。

中国的近代化最先从军队开始，这既是外国侵略者逼出来的，又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中国人近代化观念的形成，是从对洋枪洋炮的认识开始，那时人们以为只要制造坚船利炮，就可以自强御侮，所以他们很重视近代军事工业的创立。

1861年12月（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成为我国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曾国藩把罗致的科学人才都集中到军械所，军械所为清朝军队制造了大量近代化武器。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出身在官僚家庭。他早年投靠曾国藩，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被提拔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侵略军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使用外国武器，打

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

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又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这时候，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自我介绍说会制造军火，愿意出力。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任命他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又给他一笔款子，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

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就在上海松江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炮弹和枪支。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着一批中国工匠进局跟随马格里等外国人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立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购买了一套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弹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

公元 1865 年（同治四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到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叫“金陵制造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 4 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例进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改名叫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造各种枪炮弹药，也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

此时，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生产洋枪洋炮。清朝廷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族贵族不利，于是，恭亲王奕訢就授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后来，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和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

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洋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又购买了几门外国新式大炮，都配置在大沽炮台。

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是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除了赚钱之外，还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愿意干了。

李鸿章加强了大沽炮台的装备以后，下令让那里的大炮进行试放，大炮就是马格里监制的。试放的这一天，7 个中国士兵把 68 磅重的炮弹装进炮筒、便开炮了。然而，两声巨响过后，7 名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惨死在阵地前。原来炮弹还没飞出去，炮身已经自我爆炸了。李鸿章气得脸色煞白，立刻派人去叫马格里到天津来，让他亲自试验。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试验的结果，大炮照旧爆炸。李鸿章劝他承认错误，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李鸿章不得已将马格里撤了职。

其实，事情的原因很清楚。大炮安装在大沽炮台是为了对付外国入侵者的，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了。

除了办厂造军火和军舰之外，洋务派还创立了许多海军学校。1890 年前设立的这些海军学校，为中国海军培养了 130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如严复、邓世昌、刘步蟾、詹天佑等，为国防建设及其他事业作出了重

大贡献。

19世纪70年代，近代工业进入民用企业阶段。军用工业虽然仍在继续发展，但民用工业日益处于显著地位。

60年代初，私人的洪盛机器碾米厂出现，它标志中国近代民用工业将要出现。1872年，广东南海商人陈启源创办起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同年，李鸿章开始筹办轮船招商局。1873年1月4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这样，民用企业发展的时代就正式揭幕了。从此以后，近代民用企业陆续出现。从1886年（光绪十二年）开始，每年要新增加七八家。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共建成民用企业117家。

经过洋务派对军工企业的艰苦经营，近代化风气渐开。私人创办民营企业的数目也在增多。当然，此时创办机器工业的阻力仍然很大。当时搞近代化，除了上层顽固派官僚反对外，下层人民中的反对力量也相当大。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第一个民营企业出现后10年之久竟无响应者的原因。民用企业开办的头几年总是以官办、官督商办居多。由于洋务派的努力，克服了外来的种种干扰和阻碍，才使风气渐开，近代民用企业才得以发展。

近代企业一经创办，就要按照经济规律发展。洋务派先是以以为只要仿制洋枪洋炮，便可自强，就可以使国防力量强大，所以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最先都是军工企业。不过，他们已认识到：如果离开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兴办国防工业，即使一时可以奏效，那也是无法持久的。洋务派从实践中认识到军事工业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关系，迫切需要大量的铜铁和煤炭供军事工业使用。这样，发展煤铁业，就成了必然之势。

发展民用企业也起到了一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因为机器和原料都要从外国进口，这就需要大量经费。李鸿章等人感到筹款困难，所以又着手办了一些能求“富”的新式民用企业。

当时，由于军事压力大，军费开支也非常多。加上外国侵略者又把商品大量输入，使中国财政收入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显然不能供给军事工业较大开支；“百方罗掘，仍不足用”，所以洋务派就考虑到“借求富以求强”，由单纯发展军事工业转到发展民用的一般工矿业上来。

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富足。只有富，才能强。只求“强”终究是权宜之计，而非根本之图，过了一定时期就必然把“富”提到日程上来。所以，从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的重心便由求“强”转到求“富”上来了。

民用企业一般分四种经营形式，即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就是由政府派官员来管理，私人投资出钱，企业的盈亏也全由私人负责。像上海的轮船招商局、河北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黑龙江漠河金厂、汉阳钢铁厂、云南铜矿、兰州机器织呢局等，就是这样的企业。后来，又出现了“官商合办”的企业，就是政府和商人共同出钱作资本，官员和商人共同管理和经营，如贵州制铁厂、上海华新纺织新局、华盛机器纺织局、湖北纺织局等。官商合办，是官方出一部分资本，其他资本则由商人认股，经营管理权则往往由官方操纵。

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四种形式，在工、矿、交通各行业中都存在，但情况有所不同；官办的多是一些重大的工矿企业，商办的多是轻工纺织业，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全国创办的87个商办企业中，丝厂占有48个。商办企业的兴起，与交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87个商办

企业，除去重庆、南昌、南京、长江流域建有 8 个之外，其他的均建在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其中广东顺德的丝厂占有 41 个。至于官督商办企业，则以矿业居多。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民用企业，包括交通运输、矿业、冶炼业、一般工业等。

洋务派办的交通运输业，主要是航运和铁路。航运业主要是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建于 1872 年（同治十一年）末 1873 年初。它是洋务派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

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招商局最初经营不利，李鸿章对招商局进行改组，以唐廷枢为总办，使招商局扭转了不利局面。

轮船招商局的成立，虽然没有把外国轮船完全逐出中国水域，但它确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夺回了部分权益。

招商局经过了十分坎坷的历程，但它一直存在下来，到 1947 年 11 月止，共有船 460 艘 33 万余吨，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洋务派所办近代交通运输业，在陆路交通方面主要是修建铁路，在中国修建铁路者，最先也是外国人。

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要求修筑铁路。1876 年开平矿务局成立，煤炭要外运，客观形势要求修筑铁路以应急需。唐廷枢明确提出“开煤必须筑铁路”的主张，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最后清政府批准修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1881 年竣工。这是一条单轨铁路，最初用骡马拖拉，主要用于运煤。几个月后，由于自制火车头成功，才开始用机车牵引。这是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揭开了中国陆路交通的新时代。从此，铁轨不断在中国大地上伸展。

到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发生变化，深知兴修铁路，对军事和商业都非常有利。清政府同意修筑由大沽至天津的铁路。清政府将修铁路一事划归特别设立的海军衙门办理。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到 1893 年（光绪十九年），唐胥铁路南延至天津，北伸至山海关外的中后所。刘铭传在台湾修的基隆——台北——新竹铁路，也于这一年通车。到 1895 年前，全国修建铁路长达 360 余公里。

中国近代矿业的产生是从机器采煤开始的。到 70 年代中期，洋务派在创办了几个近代军工企业之后，又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于是燃料供应，日见紧张；如果继续依靠洋煤，不仅花费太大，而且洋人一有机会，就故意卡我们的脖子。特别是在中外关系紧张时，一旦洋煤断绝，势必使各厂的生产陷于停顿。因此，解决煤的供应问题，已急不容缓。洋务派主张借用外国开挖机器，开发中国自己的煤矿。1875 年 5 月（光绪元年四月），清政府命令李鸿章、沈葆楨先在磁州、台湾试办煤矿。于是，直隶磁州煤矿、台湾基隆煤矿于同一年（1875）分别由李鸿章、沈葆楨开始筹建。

洋务派开采的煤矿还有开平煤矿。开平煤矿又称开平矿务局，经营方式是官督商办，于 1878 年（光绪四年）开始钻探，次年就使用外国机器，按新式方法开采。两年之后，开平矿务局日产煤五六百吨。除供各局及中外轮船之用，还可以供内地民间日用，而且煤炭质量很好。

1875 年（光绪元年）到 1891 年（光绪十七年），洋务派在各地办的新式煤矿有 16 个，其中官办的有 6 个。这些煤矿，有的成绩显著，有的因资金短缺或亏折等原因而停办，但是，它们都经过勘查，明确了矿藏，打了井，

并用机器进行了开采，为中国近代煤矿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一些煤矿一直开采到今天。徐州利用驿煤矿，目前已经发展到徐州周围地区，年产总量达 1200 万吨以上。

随着近代煤矿业的发展，近代化机器开采也推广到其他金属矿业。

电报业是洋务运动中成效最显著的行业之一，它完全是出于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1879 年（光绪五年），李鸿章在天津架设了一条由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之间长约 40 英里的电线，并于当年 6 月开始使用。这条电线架设后，李鸿章又计划架设津沪电线。1880 年 9 月，李鸿章正式奏请架设津沪电线。这年 9 月，李鸿章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并于紫竹林、大沽、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等处设立分局。津沪线路从天津至上海，全长 2500 公里，用银 17.8 万余两。1882 年（光绪八年）4 月，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又架设通往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诸省线路。

1884 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并在各地设立电报分局，经营电报业务。电报局又由上海架线至武汉，从广东发展到广西，从天津发展到东北三省。至 1885 年（光绪十一年），沿江沿海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李鸿章对津沪线路十分满意。

由于洋务派的努力，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异常迅速。电报总局成立 10 周年时，电报线已遍布全国各地。东北达吉林、黑龙江，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 22 省。由于洋务派兴办电报，架设电线，不仅使企业因掌握了信息而盈利，并且为国家节省了不少开支。洋务派办电报，使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电报的企图一直未能得逞，保护了中国主权。1879 年至 1894 年（光绪五年至二十年），洋务派架设的联系全国各地的线路共 44 条。

中国近代邮政于 1878 年（光绪四年）试办。为了创办中国邮政，限制外国的“客邮”，李鸿章于 1876 年（光绪二年）提出自办全国邮政的主张。1878 年 3 月 9 日（光绪四年二月初六日），李鸿章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 5 处，仿照西方办法，试办邮政。这年 7 月，印发了中国第一套以大龙为图案的邮票，面值银分 1 分、3 分、5 分 3 种。

洋务运动创造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在中国的大地上，洋务派创办了第一批近代军工业，第一批近代煤矿业，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厂和钢铁联合企业，第一批近代纺织厂，第一个轮船制造厂和轮船航运公司，第一条铁路，第一条电报线路；又办起了第一批近代外语学校、科技学校、军事学校，第一次派遣留学生，第一次建设近代海军。洋务运动在全国传播了近代科学技术。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许多新事物。洋务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洋务运动中，这么多工厂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使古老的中国出现了近代工业。这些工业采用机器生产，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比中国旧式的手工业当然是一大进步。大量厂矿企业的建立和采用机器生产，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也就自然促进了商品交换，修铁路、办交通等也就成了可能的事了。同时，洋务派还办学校，培养了一些技术人才，著名爱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还促使一些人办起了纯粹私人经营的企业，虽然规模较小，又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打击，但表明了中

国已经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

至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它的产生并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但是，洋务运动开始以后，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多了。当然，洋务运动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在洋务派所办的各项企业里，都存在封建的官场恶习，一些缺乏近代化知识的贪官混进了企业，他们利用经营近代企业的机会谋私利。另外一些带有程度不同的封建习气的官僚地主；在企业里当权或掌管某些方面的业务，不可避免地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加上封建顽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对企业进行种种压抑和排挤，使洋务运动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过，我们决不可以此而抹煞洋务运动创业性的进步意义。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新的生产力，使中国跨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开始创建新的社会的物质条件。洋务派兴办各种企业，从西方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序幕。洋务运动要求破祖宗之成法，开新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学说，它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洋务运动使中国的军队开始有了新的武器和装备，初步奠定了近代国防的基础，不仅在对外战争中减少了损失，而且有时能给予外国侵略者以痛击。由于洋务派的努力，阻止了外国资本主义任意在中国设厂和办矿，为国家收回了某些权利。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的一页，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

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更加腐朽和反动。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大借外债，引狼入室；对内加重盘剥和搜刮。巨额的战争赔款，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天灾人祸，使劳动者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社会矛盾更趋激化。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群众性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不断涌现，此起彼伏，烽火不熄，到八九十年代呈现出高涨的趋势，并逐步汇合成一股反帝斗争的滚滚洪流——即举世震惊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是以义和拳为主的民间习武结社，在与白莲教相结合的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互相渗透逐步深化发展起来。

义和团各团的首脑机构叫“总坛”，首领称“老师”，基层组织叫“坛口”，隶属总坛，首领称“师兄”。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一但有行动，往往发贴联络，相互支持和配合。义和团的成份很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主要是以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组织。义和团有比较严格的纪律，但是这些纪律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遵守的。运动进入高潮后，违纪自擅现象相当严重。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是“扶清灭洋”，但在义和团发展的不同阶段，口号有变化，各地并不完全一致。从总体上看，义和团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反帝爱国的性质自始至终都是很明确的。由于义和团是农民群众进行反帝斗争时可能利用的现成的组织形式，因此，在它的活动中必然带有文化落后以及闭塞的农村中所固有的迷信色彩，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总之，义和团是自发的农民群众运动，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带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一定的笼统排外的倾向。

义和团活动的主要地域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以及豫东和苏皖北部一带。义和拳在山东的反帝斗争开始于 80 年代。1886 年，冠县民众就在义和拳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教会霸占农田改建教堂的斗争，直到 1895 年甲午战争后，人民群众反帝斗争高涨，义和拳也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1896 年，鲁西南的大刀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被残酷镇压之后，又和义和拳并肩战斗，转战山东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洋教斗争，倍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劳动人民，纷纷加入义和拳，以反抗洋教和官吏的压迫。

1897 年德国占胶州湾、英国居威海卫以后，义和拳在山东的反洋教斗争和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结合起来，迅速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1898 年，冠县义和拳在净书勤、赵三多的领导下，竖起“助清灭洋”大旗，焚毁教堂，揭开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新篇章。日照县义和拳发动群众开展对德国传教士的斗争，其他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侵略者面对义和拳的迅猛发展，吓破了胆，要求清政府加强镇压。1899 年初，清廷改派刽子手毓贤取代镇压不力的张当梅为山东巡抚，妄图以更残酷的手段扼杀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是，反帝反封建斗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谁也无法阻挡。1899 年 9 月，爆发了朱红灯领导的平原起义，吹响了义和拳大规模反抗斗争的进军号角，义和团在鲁西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

清朝地方官员面对蓬勃兴起的义和拳运动，大体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义和团来源于邪教白莲教，只能通过“剿”来扑灭。平原县令蒋楷和后来的山东巡抚袁世凯都是这一主张的坚决执行者。另一种主张“抚”，认为义和团的斗争锋芒主要针对着外国人，且势力强大，武力镇压会激起民变，

所以应该收编义和拳。毓贤所采取的由剿到“抚”的策略，客观上有利于义和拳的反帝斗争在山东的发展，但也使义和拳认清官府的丑恶嘴脸，以至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一些义和拳营领袖被官府诱杀。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度恐慌，逼迫清政府严厉镇压。12月，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撤换了毓贤，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死心塌地投靠帝国主义，力主严剿义和团，在山东推行血腥的屠杀政策。在战斗中，义和团勇士一批批地惨死在屠刀下，到1900年春，除少数团众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战斗在直隶边境及各县交界的少数地区外，大部分义和团则暂时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或暂时解散。从此，山东各地义和团反帝斗争暂时转入低潮。袁世凯虽然做到了使自己统治下的山东没有大规模的义和团活动，但是毕竟不能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这场大火。这时义和团的活动中心渐渐由山东转移到了直隶，掀起了更大的反帝风暴。

直隶是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中心也是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最集中的一个地区。饱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和教会势力欺压的直隶人民，长期以来就不断掀起反封建、反瓜分和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之后，很快就蔓延到毗邻的直隶省，到1900年春夏，义和团的组织几乎遍及直隶所有州县。直隶总督裕禄派重兵镇压，被义和团在涞水和涿州打得屁滚尿流，裕禄又派出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聂士成武卫军前往镇压，同样不见成效。

义和团在畿辅地区的迅猛发展，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慌和震动。主剿派认为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才能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主抚派认为义和团已成燎原之势，镇压不得，况且在京城附近动刀动枪也过于危险。慈禧很快倾向于主抚，下令停止军事镇压，同时派刚毅、赵舒翹等大员到涿州一带去宣布朝廷“德意”，以示安抚。聚集在京郊务地的义和团趁势涌入北京城内。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在北京的力量越来越大，帝国主义侵略者又要挟清政府交出大沽炮台，并声称增兵进京保护使馆。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由“剿抚并用”变为“安抚”，企图加以控制利用，于是义和团大批开进北京。北京城内的广大手工业老和城市贫民，积极参加义和团，到处设坛练武，制造新式武器，烧毁教堂，义和团运动进入了高潮。

与此同时，义和团在天津的活动也日益高涨起来。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北部的重要侵略基地。长期以来，天津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始终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斗争。1899年，山东和冀中的义和拳陆续传到天津，农民开始秘密传习。1900年2月，天津城内已有义和团的公开活动，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虽然多次谕令查禁，但均告无效，义和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在天津城内发展，义和团在天津市声威大震。

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北京的蓬勃发展，震动了全国上下，激起了强烈的反响，1900年春夏间，人民反帝斗争的怒火迅速燃遍中国大地。山东义和团重又掀起反帝斗争的新浪潮；遭受沙俄蹂躏的东北三省，义和团的斗争形成了很大声势；山西省的义和团也十分活跃，猛烈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蒙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遍及了整个草原；河南省在山东、直隶等地义和团斗争浪潮的影响下，人民群众也迅速地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风暴。当义和团爱国运动席卷中国北部地区的时候，中南、东南、西南等地的广大人民群众也纷纷响应，绝大多数省份都发生了以打击教会为目标的群众反帝斗争。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后不久，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当清政府的

招抚政策日占上风的时候，绣着“扶清灭洋”四字的义和团大旗高高飘扬。

当帝国主义列强看到形势的发展已严重威胁到他们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打击，就改变了过去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做法，决定直接派兵镇压义和团，并妄图乘机瓜分中国，从而发动了一场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又一场殊死搏斗开始了。

1900年5月28日，各国驻华公使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并借“保护使馆”为名，把调兵进京的决定通知清政府，慈禧屈服于各国的压力，竟同意洋兵进京。5月30日至6月2日，各国侵略军400余人陆续由天津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集结在大沽口外的俄、英、日、美等国的24艘军舰和天津租界内的2000多名侵略军也在待命行动。

6月10日，英、法、美、俄、日、意、德、奥八国组成了一支2300人的联军，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的指挥下，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八国联军在沿途处处遭到义和团的英勇阻击，花了4天时间才走完全程的一半。当侵略军到达廊坊时，被义和团和董福祥所率清军围阻。进退不能，弹尽粮绝。西摩尔率残兵败退途中又被围于杨村车站，直到26日才在沙俄援军的帮助下逃回天津租界。在这场阻击战中，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一起战胜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侵略军，粉碎了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沉重地打击了八国联军的嚣张气焰。

当西摩尔联军遭到惨败时，帝国主义者又谋划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攻占了大沽炮台，并使之成为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集结在大沽口的大批侵略军，纷纷从大沽口外登陆，进犯天津、北京，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与此同时，以“保护使馆”为名进驻北京的侵略军，气焰非常嚣张，经常开枪射击义和团民、普通群众以及守城巡街的清军。帝国主义分子的肆意滥杀，激起了义和团众和广大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和英勇反抗，德国公使克林德就由于直接参与屠杀活动而被中国士兵当场击毙。

在八国联军大举进犯，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已与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形势下，清朝统治者内部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一些大臣力主要把义和团当作乱民镇压下去，这样才能巩固政权，并使洋人满意，不再派兵入京。这代表了洋务派官僚的立场。当时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以及光绪皇帝都是支持这种立场的。载漪、载勋、载澜、徐桐、刚毅等王公大臣则认为义和团势力已经无法扑灭，如果强行剿办，就会在京畿一带酿成大祸，不如招抚义和团，依靠他们的“法术”来消灭洋人势力。这一派所代表的是封建主义极端守旧派的主张。

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对“和战”问题举棋不定。她深知义和团是清廷的心腹大患，消灭义和团是她的既定方针。但她又痛恨帝国主义庇护康梁，在废立问题上对帝国主义也很为恼火。戊戌政变后，西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心想废除光绪，但都因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干涉未能实现，使西太后既怕又恨。八国联军突然攻陷大沽炮台，气势汹汹地扑向天津、北京，已经引起了慈禧后党的极大不满，而顽固派为了促使西太后早下战书的决心，捏造的列强令慈禧归政皇帝的假照会，更如火上浇油，使西太后既悲且愤，极为恼怒，于是连日召开御前会议。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朕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赴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离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言词慷慨激昂，但并无切实的御敌方略，而

且这道宣战书没有说明是谁对谁开战，也从未以任何形式送达任何外国政府，而只是内部发布而已。

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对外宣战，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对统治权力的争夺，也反映了列强主子和清廷奴才之间还存在着矛盾的一面。西太后宣战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借对外战争之名躲过农民革命锋芒的打击，避免义和团的刀锋落到以她为代表的统治权力的头上。并且对义和团加以控制，把他们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第一线上，借八国联军的枪炮来消灭义和团；同时，也为了发泄自己对列强阻挠其废立计划的不满，幻想以此促使列强放弃对光绪帝的支持，一旦“废立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

西太后政府在宣战后，打着“御侮”的旗号颁布了正式招抚义和团的上谕，任命奕勋和刚毅等人办理义和团事宜，从事欺骗和控制义和团。自此，义和团被清政府所利用，使原来自发性的群众团体变成了封建顽固派盲目排外的马前卒。在慈禧的指挥棒下，上当受骗的义和团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迎战帝国主义的枪炮。与此同时，西太后一再向各省督抚表明苦衷，向帝国主义表明苦衷。对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暗中加以保护，积极与帝国主义谋求妥协。

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在宣战前都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反对朝廷对义和团实行“招抚”的政策，唯恐得罪洋主子。宣战后，这些老奸巨滑的官僚深知慈禧发布宣战上谕，只是权宜之计，并无开战的决心，因此扣压宣战御旨概不执行。这些帝国主义的奴才绝不愿得罪自己的主子，在他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内，竭力保护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压制人民的反帝斗争。

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还在清廷的默许下，勾结帝国主义，搞了所谓的“东南互保”。经过一番谋划，6月26日，刘坤一、张之洞的代表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制定了《东南保护条约》等章程，明确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各督抚要“严拿匪徒”，“切实保护各国商民教士的产业”。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秩序”。参加东南互保的，先后有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山东、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从表面上看东南督抚的这些行动，与清政府的所谓“宣战”似乎相互抵触，其实不然，它们出卖祖国镇压人民的本质是一样的。“东南互保”是帝国主义阴谋割裂中国领土分而治之，建立殖民地政权的尝试。它阻碍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破坏了南北方反帝斗争的相互声援，使得帝国主义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集中兵力在北方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与东南督抚的相互勾结，是后来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插手中国地方政治，培植军阀代理人的预演。

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激起了义和团的英勇抵抗。他们在少数清军官兵的配合下，英勇无畏地战斗在反侵略战争的最前线，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京津保卫战，是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高潮。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大举向天津进犯。下午，400多名侵略军从塘沽到达城郊陈家沟时，受到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阻击，纷纷败退。陈家沟的胜利和人民的热烈支持，极大地鼓舞了义和团抗击敌寇的勇气。6月18日，曹福田指挥义和团与沙俄侵略军在老龙头火车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战斗中，由妇女组成的“红灯照”，同男子一样舍生忘死

地冲杀在反帝斗争的前列。曹福田、张德成还指挥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华据点之一的天津紫竹林租界不断发起猛攻，打得敌人招架不住。与此同时，义和团在天津机器局和津塘线上，也与敌人全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天津市区的战斗。

7月初，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反动的清王朝宣战不过10来天，就撕下了假面具，露出了镇压人民的起初嘴脸，大肆屠杀义和团众。帝国主义国家更是调兵遣将，增兵至数万，大举进犯，天津保卫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7月9日，八国联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城西南进攻，义和团在纪家庄与侵略军展开激烈战斗，血流成河；直隶提督聂士成身先士卒，率领官兵在南郊八里台与优势强敌激战，壮烈牺牲，其部下和团民也多为国捐躯。可是在这紧要关头，清朝军政大员裕禄、宋庆等不谋划战守，竟然率部弃城而逃。14日凌晨，日兵用炸药轰塌城墙，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在同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后，于当天下午撤出战斗，天津沦陷。

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立即组成了一个联合的军事殖民统治政权——都统衙门，统治天津、静海、宁河等广大地区。这个殖民统治机构对中国人进行极残酷的剥削和勒索，并指挥侵略军对天津市民实行血腥屠杀，纵火抢劫，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列强还借此大肆扩充租界地。

在天津义和团开展反对帝国主义英勇斗争的同时，北京的义和团也燃起反帝斗争的熊熊大火。他们掏外货，痛打侵略者，并围攻帝国主义重兵据守的西什库教堂达63天，使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北京义和团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却为清政府所利用。居心叵测的顽固派集团为了发泄对帝国主义主子的不满和借帝国主义屠刀摧残义和团力量，挑动义和团去攻打东交民巷各国驻华使馆，给列强增加了扩大侵略的借口，义和团则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可是，正当义和团以血肉之躯与帝国主义者的洋枪洋炮拼搏的时候，慈禧已暗中派人前往使馆接洽和谈，实施“明攻暗保”使馆区政策。清政府给使馆区送去各种生活用品、文件抄报，以此来给帝国主义分子拍马屁，求得列强对攻打使馆的谅解。同时，千方百计阻挠义和团的攻势，与帝国主义一起夹击义和团。

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余人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慈禧闻讯十分惊慌，决心求和。她正式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并把京城的义和团调往前线，以便延缓八国联军的进军步伐，同时企图借用帝国主义力量来消灭义和团。

8月13日，八国联军直抵北京城下，次日攻破城门。15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和亲信臣仆仓皇出逃。此时，王公大臣和清军将领都已纷纷逃窜，驻京及直隶的10余万清军不战而溃，只有在清政府的大肆摧残下力量已极其微弱的义和团还在大街小巷与敌人进行浴血苦战。北京城终于沦陷。

八国联军在整个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联军攻占北京后，这种现象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八国联军还在北京划分区域、分段占领，并组成“北京管理委员会”。进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又分兵四处攻掠，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范围内。

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本质上是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名为向帝国主义“宣战”，实质上是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卑劣目的。在北京沦陷前，阴险狡猾的慈禧太后慑于义和团的威力，还不敢十分公开地

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北京沦陷后，她彻底撕破伪装，卖国嘴脸便充分暴露出来。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催令李鸿章迅速北上，授以卖国乞和的全权。她还发布谕旨，通令各地清朝官兵对义和团要“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表示要用中国人民的头颅作为她向帝国主义献媚的礼物。奕欣、荣禄、李鸿章等秉承西太后的意旨，急电直隶文武官员，“放胆剿匪”，不准清军与联军冲突。于是清军立即调转枪口指向义和团，并主动配合联军作战，甚至无耻地服从联军的指挥。有些中国官员还卑恭屈膝地前往慰劳屠杀义和团的侵略者。

中外反动派把义和团视为共同的敌人，在这个基础上，国内外反动势力公开联合起来，共同剿杀义和团。各地的义和团遭到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淹没在血泊中。但是各地的义和团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斗争，他们化整为零，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手段，到处袭击侵略军和清朝官府，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血的教训使他们认清了清政府的丑恶面目，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这一变化，说明义和团余部对封建统治者的认识深入了一步，从而朴素地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

在八国联军进犯京、津的同时，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调集 15 万军队，分兵 7 路，大举侵入我东北地区。到 10 月占据了东北地区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沙俄政府妄图独占东三省，使东北沦为沙俄的殖民地，以实现其“黄俄罗斯”的狼子野心。沙俄军队在进犯东北的过程中，到处烧杀淫掠，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极其野蛮的罪行。沙俄军队在海兰泡、江东 64 屯、瑗珲、伯力等地，枪杀、水淹、火烧致死的中国人不下 20 余万，东三省省城和各重要城镇的粮饷、军火、财物都被沙俄军队洗劫一空。这种暴行充分反映了沙俄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

我东北地区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在入侵者的野蛮屠杀面前屈服，而是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奋起反抗。沙俄军队到处遭到东北人民的英勇抗击，终日惶惶不安。沙俄的侵略暴行和独占东北的企图传出后，全国群情激奋，同声怒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其自身利益也反对沙俄独吞东北，沙俄被迫于 1900 年 4 月同清政府签约撤军。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 1900 年 6 月 21 日“宣战”后不久，就准备投降卖国。7 月 3 日，清政府直接向俄、英、日等发出“国书”乞和。8 月 7 日，八国联军将攻下北京城，清政府正式任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全权谈判大臣，来京与各国谈判投降事宜。到 1901 年 9 月签订《辛丑条约》，整整拖了一年多时间，其间除了帝国主义为强迫清政府彻底屈服以取得更多的奴役中国的特权外，更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争霸中国的斗争空前尖锐和复杂，各列强间需要协调他们之间瓜分中国的政策。

攻占北京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代除乱民”的幌子下，暂时勾结在一起。占领北京后，他们过去潜伏着的矛盾暴露无遗，出现了以英、俄两国为主要对手，分别包括德、日和法、美等国的两个利益集团继续争夺中国的激烈的斗争。结果到 11 月间，英、德、日向俄、美、法作了妥协，各列强对华政策基本上趋于一致，承认皇太后（慈禧）为合法，接受庆亲王奕欣和李鸿章为议和大使，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交换条件是清政府全部接受各侵略国提出的要求。流亡西安仍肆意享乐的西太后，接到公使馆提出的“议和大纲二十一条”，如获大赦，赶紧指示奕欣和李鸿章全部答应条约内容。她还指示下属：“量中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真是无耻之

极！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欣等代表清政府，与英、美、俄、日、德、法、意、奥、荷、比、西等11国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2款以及19个附件。主要内容有：

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军费白银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多的一次赔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空前规模的敲榨勒索。这样，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田赋外，几乎所有税收都由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进一步为帝国主义所操纵。各省官吏不仅把这些沉重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和工商业者身上，而且还乘机加派加摊，肆无忌惮地盘剥勒索以自肥，使中国人民更深地陷入被剥削、被奴役的苦难深渊，中国社会经济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

2、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到大沽沿路的所有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所战略要地；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民不准在该区域内居住。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势力成了“国中之国”，中国的主权沦丧，国防废弛，完全处在帝国主义的军事控制之下，只能在列强的刺刀下行使奴隶总管的职权。而以武力为后盾的驻华使馆成了支配清政府的至高无上的太上皇。

3、惩办义和团运动中与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和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皆斩”，地方管辖区内如发生此类事件，清政府的各级地方官吏“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就是说，中国人民是奴隶，永远不得反抗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各级官吏，是他们统治中国人民的大大小小的奴隶管理员，作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必须切实负责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和组织，永远忠于主子的利益。

4、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以办理今后对外事宜。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是清政府的卖身契，也是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新罪证。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对华政治、经济及军事的控制和掠夺加重了。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但是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后的一系列媚外丑态，活现出清朝统治者对洋主子摇尾乞怜的无耻嘴脸。从此，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辛丑条约》表明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主奴关系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

世界进入 20 世纪时，西方列强乘着工业革命的列车正高速发展，而中国这头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老牛仍然在荒地上艰难地蹒跚前行。腐朽的清政府不但不积极寻求自强之路，反而在帝国主义的欺侮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中国此时此刻正处在最黑暗的关头。

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打掉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的王冠，革命的火焰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民主共和的旗帜插上了这块古老而辽阔的土地。

中国新的曙光就从这里开始。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后，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步地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国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战争。特别是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急剧加深和列强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外国强盗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和港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瓜分的狂潮。但是，义和团运动的怒潮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美梦。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清王朝存在的最后 10 年里采取了军事以外的侵略方法，即主要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侵略。因此，到辛亥革命前夕帝国主义已经基本垄断了清政府的财政、外贸、铁路、交通、工矿等等。总之，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内政外交，清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俯首贴耳于洋人的“听命朝廷”。到 1911 年，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 9618 公里铁路的 93.1%；1912 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煤矿机器开采占 91.9%；1894~1911 年，帝国主义共借给清政府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和高额利息规定的款项白银 12 亿余两；20 世纪开始后，清政府对外贸易平均入超 12000 万海关两……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不能不令有识之士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寻求出路、拯救中华已经到了无法再等的地步。

历史进入到 20 世纪，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穷凶极恶的八国联军入侵，内外交困使清政府也认识到非变革无以生存。1901 年起清政府陆续推行所谓“新政”。主要措施有：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校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止妇女缠足之类。但这都是在不触动封建统治下的“皮毛之举”。1906 年，清政府于 9 月间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立宪的“预备”。

1906 年 11 月，清政府公布中央官制，行政中枢军机处照旧不变，对某些部的名称作了更改，并增设到 11 部。1907 年，清政府公布地方官制，将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分别收归陆军部和度支部，削弱了地方实权。

1908 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 9 年为预备立宪期限。

但是，在所公布的《逐年筹备完政事宜清单》里，根本没有涉及到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等实质性问题。清政府毫无诚意的作法，激恼了立宪派。1910 年，立宪派连续发动了三次请愿运动。清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表示缩短预备立宪时间，一方面严厉镇压请愿运动。1911 年 4 月，以奕诤为首的所谓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在 13 名内阁成员里，汉族大臣只有 4 人，而在 9 名满族大臣中，皇族竟占了 5 人。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皇族内阁”。立宪派这才知道上了大当，在《宣告全国书》中哀叹“希望绝矣”。

至此，清政府以其丑恶的表演不打自招地表示了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决心。

面对着列强日甚一日的侵略和清政府越来越腐败、残酷的专制统治，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停止反抗活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团结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894年，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成立。此后，华兴会，光复会等各种革命团体纷纷出现。它们宣传革命，投身实践，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1905年8月，孙中山联合一些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团结同盟会成员和其他革命志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例如，通过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大规模的论战，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又如，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发动、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正是有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周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运动，才使清政府的专政统治岌岌可危……

作为交通运输大动脉的铁路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争相投资和主要目标之一，因为铁路伸到哪里殖民侵略势力也就能达到哪里，更何况清政府当时一贫如洗，债台高筑，因修筑铁路所借的外债都附有诸如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等十分苛刻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条件。

在修建铁路过程中，清政府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根据双方协定，美国以4000万美元的借款总额在5年内筑完该路，清政府不得转让给别的国家修建。清政府则答应美国有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等。可是，后来该公司不仅没有按时完成筑路协定，而且还将三分之二的股票卖给了比利时。美国的背信弃义激怒了广东、湖南、湖北民众。三省人民以无比愤慨的激情力争“废约自办”。全国人民也积极响应支持这一正义要求。1905年8月，粤汉铁路已修路段被以675万美元“赎回”，所借英国的“赎费”由三省人民筹还。粤汉铁路和剩余路段由三省自行筹资“商办”，清朝当局不愿意把铁路交给商人办，坚持实行“官督商办”。湖南依靠全省征集到的股款，在宣统元年二年（1909年到1910年）筑成了长沙到株洲间的110里的铁路。就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争回粤汉铁路商办的翌年，清政府忽然宣布“铁路系国家要政，仍应官督商办”，并命令湖广总督张之洞立即着手办理。不久，又命令已调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兼领粤汉铁路督办，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路，张之洞认为这些铁路的修筑非靠外国力量不可。正在他同英、法等国酝酿借款成熟的时候，湖北、湖南两省的绅商学界起来反对。他们主张拒绝借外债，要求“商办及自营自办。”到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公然发布“上谕”，宣布：“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并威胁“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接着，一面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一面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杀气腾腾地南下强行接收商办铁路。一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开始了。

而在斗争中表现最激烈、最坚决的当属四川民众。川汉铁路是西南的主要运输干线，地位特别重要，更使得帝国主义垂涎三尺。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后，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和端方即于6月1日联名要求本属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的所有款项全部换成国家铁路股票。消息传出，舆论大哗。6月

17日，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集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被推为保路同志会的会长和副会长。接着派员分赴各地组织成立分会。这一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10天之内四川各地均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分会，会员达10万余人。

保路同志会一成立，即开始了保路斗争。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决定罢市、罢课，立即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当时的报纸称：“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成都将军一份奏折则称：“通省扰动，兼顾实难。事势之危，间不容缓。”9月份，全省又开展了抗粮抗捐斗争，部分地区还发生了群众暴动。

面对来势汹涌的反抗怒潮，清政府严令四川总督赵尔丰迅速加以严厉镇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接着枪杀了数十名前来请愿的群众，并发布了戒严令。赵尔丰原想强制这些绅士把运动平息下去，他也没料到，这一来，反而使矛盾大大激化了。就在当天中午，几千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那些被拘捕的人，赵尔丰下令向群众开枪，杀死了30多人。从此，全川人民纷纷拿起武器。

血腥屠杀唤醒了人民。全川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同盟会员龙鸣剑制成“水电报”将成都血案及时通报了各地，并联络会党组成了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和王无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革命政府。

为了镇压四川革命风暴，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调来了三位总督级大员，即先命端方率领湖北军队从速西上救援，接着又加派两广总督岑春煊和赵尔丰“剿抚兼施”。为此，共调动了湖南、湖北、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六省军队。

保路运动特别是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先生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始终密切注视着四川的局势。孙中山早就预言：“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因此不断地派遣人员到四川从事革命活动。四川保路斗争开始后，黄兴、朱执信就急电孙中山“请设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使革命党人中存在的“已灰之心复燃”。湖北革命党人趁机“急得起义”，请黄兴“回鄂省主持军务”；湖南革命党人则与军队“计划加紧发难办法”。就在端方率领部分鄂军西去不久，湖北方面趁着清政府统治力量薄弱之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历来都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十分重视的地区。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这里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团体，如科学补习所、文学社、共进会等。这些革命团体在宣传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造成革命声势、发动士兵、群众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湖北新军中士兵的争取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到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中的标、营、队等基层组织中都有了革命党人的代表，新军中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湖北革命党人确信必须在长江中游的湖北举行起义。保路运动兴起后，全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湖北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极大鼓舞。为了加强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共进会和文学社这两大革命团体决定抛弃前嫌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其实，共进会起源于同盟会，文学社也赞成同盟会纲领，他们本来就有携起手来的基础。1911年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举行了第

三次联席会议，就湖北的革命形势、组织问题、军事部署、革命经费等作了广泛的讨论，并决定派居正等人去上海同盟会总部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来武汉担负领导责任。但遗憾的是此时黄兴还在香港，一时无法到达武昌，宋教仁也没有即时赶到武昌，谭人凤虽抱病同居正前往，但到武昌时起义已爆发了3天（10月13日）。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文学社和共进会在9月24日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的代表60余人参加，他们讨论和决定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且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干部人选。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孙武被推为参谋长。在政治方面，刘公被推为“总理”。刘公和孙武是共进会在武汉的主要领导人。会议最后结束时，大会主席孙武说：“我们大家所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后才就职的。军事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目前就要积极开展工作。发动日期，大家希望在富有革命意义的8月15日，（即中秋节，公历10月6日——引者注）这一天，如决定可以动手，我们临时一定会有通知，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会后，根据大会决定，在汉口宝善里成立了政治筹备处，制作起义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小朝街成立了军事指挥部。

黄兴在香港得知湖北的情况后非常高兴，认为“似较粤为善”，建议“如此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8月15日中秋节，因为准备不及，延期到8月20日，但是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出去，湖北当局加强了戒备。于是，立即召开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官以上的联席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节日不放假，子弹全部收缴，楚望台军械库加强警戒。武汉城内立刻布满了恐怖气氛。同时，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武汉一地发动靠不住，必须等待南京、上海同时发动。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才能取得成功的说法。这些说法传到武汉，更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犹豫不决。

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制造炸弹。刘公的弟弟由于不慎将香烟灰落在了炸药上，引起爆炸。顿时浓烟大作，救火声呼成一片，沙俄巡捕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了炸药和来不及转移的供起义用的旗帜、袖章、文告、印信等，还发现了革命党人的名册。孙武立即命人将这一意外事故的发生通知了武昌的军事指挥部，建议立即行动。接到汉口失事的报告后，武昌军事指挥部经讨论一致同意马上举事，并立即起草了起义通知，包括：10月9日夜12时城内外同时起事；左臂系白布为起义队伍标志；工程营抢占弹药库；炮兵占据楚望台和蛇山轰击督署和藩署等等。至晚10时，即已向各军营通知完毕。

湖广总督瑞澂接到俄国总领事馆的报告后，大为震惊，立即采取行动。清军于是夜（9日）突袭了武昌军事指挥部，逮捕了军事筹备员彭楚藩、刘尧徵、杨洪胜等人。瑞澂立即组织军法会审，这三人在受审时，坚贞不屈，于是官方于次日（10日）5时枪杀了彭、刘、杨三人。但另外有些人在受审中立即叛变，招供了所知道的一切。官方从搜获的文件中和变节者的口供中知道了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湖北总督瑞澂宣布戒严，调集比较可靠的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途搜捕。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获，先后被捕的有30多人。由于从查获的名册中看到有大量的新军兵士，所以瑞澂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兵士出入，把兵士手中的子弹一律收缴，要各标、营的军官负责巡查。

这时革命的形势已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刻。但是，虽然起义指挥机关被破坏，孙武被炸药炸伤，蒋翊武在逃，刘公隐蔽起来，起义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但由于起义准备工作一直在继续中，加上革命党有长期的活动影响和新军士兵的高度觉悟，起义的枪声终于在10月10日夜由工程第八营打响了。

工程第八营驻守楚望台军械库，早在9月就已接到了起义爆发后首先占领楚望台的命令。汉口失事后，该营共进会代表熊秉坤于10月9日下午5时又接到军事指挥部的命令：“军械所系汝营驻守，今夜无论如何困难，一听炮声，必须即行占领。”但由于这天夜里没有听到炮声，所以没能行动。直到次日夜，在镇压了阻挠起义的反动军官后，几十人在熊秉坤的带领下冲向楚望台，在守卫士兵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军械库，接着占领了楚望台。随后，各营士兵和军事学堂的学生也纷纷起义。在革命士兵的英勇血战下，总督衙门、藩库等机关纷纷被攻陷。瑞澂狼狈逃窜。到11日上午，武昌城已全部为革命军所占领，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同日，汉阳起义亦取得胜利。12日，汉口也取得了起义胜利。至此，武汉三镇已全部为革命党人所掌握。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武昌起义也叫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在湖北各地和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积极的响应。湖北的黄州、汉川、宜昌、荆州等地纷纷举行起义宣告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而独立。各省的起义和独立浪潮亦此起彼伏。

最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上面说过，湖南和湖北革命党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本来湖北方面原计划中秋节举行易旗，后来，一方面由于湖北当局加强了白色恐怖统治，另一方面由于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派人函告因“准备不足”而要求延期10日，两省同时行动中止。武昌起义爆发后，焦达峰在12日才得到消息。而湖南巡抚余诚格在起义当天就接到警报，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命令将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新军调离长沙。焦达峰等立即授意新军代表提出了“要增加子弹”的要求，遭到了余诚格的拒绝，于是决定18日举行起义。由于余诚格加强了长沙的控制，18日的起义计划没能实行。但焦达峰等人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于19日再度筹划起义行动，决定联络会党会同新军于24日起义。可是，后来由于余诚格因得知新军即将起义的情报而限令长沙新军22日必须全部开出长沙，于是革命党人在这紧急关头发布命令于22日举行起义。

10月22日清晨，长沙新军第49标（团）士兵齐集军械库宣布起义，在发布了焦达峰和另一位革命党人陈作新的起义动员令后，这支队伍即开始攻打长沙。起义部队很快攻进长沙城，占领抚署。余诚格挂起白旗后趁机潜逃。起义军占领抚署后，立即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并发布了《讨满清檄文》。湖南起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焦达峰派出的援鄂军更是有力地支援了武汉的革命斗争。

就在湖南长沙起义取得胜利的这一天，陕西的新军也在同一日取得了起义的胜利。起义的会党和新军在西安成立了陕西军政府，推举原同盟会会员、新军协（旅）司令部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相当于营长）为都督。军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会员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过黄河攻入山西，一方面从侧面威胁了南下的清军，另一方面又切断了清政府同西北地区的联系。

10月29日山西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新军协统（相当于旅长）阎锡山任都督；10月30日，云南起义，次日成立云南政府，新军协统蔡锷任都

督；10月31日，江西军政府成立，同盟会员李烈钧后来接任都督；11月3日，上海起义，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11月4日，贵州起义，成立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荇诚为都督；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摇身一变为江苏军政府的都督；11月6日，浙江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同日，广西宣布独立，后来陆廷发动兵变出任广西军政府都督；11月8日，安徽宣布“独立”，后来同盟会员柏文蔚出任安徽军政府都督；11月9日，福州起义，成立福建军政府，第10镇统制（相当于师长）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同日，广东宣布“独立”，同盟会员出任广东军政府都督。

武昌起义的烈火也燃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总之，武昌起义的炮声震醒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点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火焰，终于焚烧了清王朝300年的统治大厦……

面对来势汹汹的革命洪流，处于四面危机之中的清政府急忙任命实力派代表人物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妄图尽快出动军队去扑灭革命的烈火。在当时成立的各省军政府中，人员成份比较复杂，主要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军阀官僚等三派政治力量。在如何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府及由谁控制这个政府的问题上，他们分歧很大，最终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集团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集团。

11月7日，篡夺了湖北革命果实的原清军协统黎元洪致电各地军政府，询问应如何组织中央政府。9日，黎元洪又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致电各独立省，希望派全权委员来湖北协商组建临时政府事宜。于是，江西、广东、广西响应这一倡议，派要员赶赴武汉。

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络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由各省谘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商讨组织政府。次日，又以苏、浙两省代表名义邀请各省迅速集会上海。江苏、浙江、上海、福建、湖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响应这一倡议，前往上海赴会。15日，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致电黎元洪和战时总司令，指出上海远离战区，交通便利，希望在上海集会。

就这样，出现了武汉、上海两个指挥中心的局面。双方为了取得控制“中央”的主动权互不相让，开展了一场电报信函战。为了把政权机关建到武汉，黎元洪采取拉拢的办法，承认上海会议推举的任廷芳、温宗尧的外交首长之职，而且许诺财政总长一职给张謇，另外还有封官许愿。同时，他还派居正到上海去劝说。

然而武汉毕竟是最早发动革命，已成为中外关注的革命中心，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主要领导这时也在武汉，加上多数省区的代表在武汉。于是，上海方面决定西迁武昌。

11月30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会议，推举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掌中央政务。这时，袁世凯已采取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已攻陷汉口和汉阳，即将要攻陷武昌。12月2日，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决议，就是设一代时总统等待袁世凯反正过来给他。这个决议充分表明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就在12月2日这天，东南重镇南京被江浙革命军攻克，革命形势立即大为改观。利用这个时机，江浙方面立即行动，一方面电邀汉口代表速返，一

方面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以得票多少选举汉阳失守后返回上海的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筹建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副元帅，仍驻武昌。会议还决定有 10 省以上代表到南京后即选举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12 月 25 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经过长期流亡后到达上海，革命力量顿时大增。在上海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当记者问他从国外带来多少钱时，他庄严答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之精神”，使孙中山赢得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2 月 29 日，17 省代表在南京集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大会决定各省有一个投票权。结果，孙中山先生以 16 票的绝对多数当选。另一票为黄兴。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了……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以巩固民国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袁世凯一刻也没有放下屠刀。他在逼迫了清帝退位、宣布拥护“共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后，从孙中山手里夺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1912 年 4 月 1 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至此，辛亥革命的果实全部为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遭到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是永远也不会磨灭的。它不仅在隆隆的枪炮声中把垂死的封建帝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更重要的是真正深入而广泛地在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之火。它的失败所得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指导着后来者以更科学的方法来彻底清除陈旧的垃圾。

